

中國歷史
之
理論的分析

拉德克 著
克仁 譯

國史館藏書



0008435

上海

辛墾書店出

1932

國史館藏書

分類號 610.01

卷數 7734

冊數 5997

國史館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中國

歷史之理論的分析

拉德克 著

克仁 譯

國史館藏書



0008435

上海

辛墾書店

1932

1929, 11, 4 初版

1932, 6, 20 再版

2001—3500 册

版 權



所 有

每册實價八角

目 錄

再版序言

- 一 歐洲資本主義開始侵入時底中國情形——土地私有制在中國是否已經存在——有沒有大批的土地佔有
- 二 當時商業資本底發展——手工業底進步——中國不能達到工業資本主義底原因
- 三 中國國家底起源——封建時代底政權——秦始皇底政制改革——商業資本底政權——元朝底政權與商業資本

- 四 農民政權之建立——農民政府轉化之原因——王莽底改革——王安石底變法——歷代政權底性質
- 五 歐洲資本主義之侵入中國——武力進政底結果：南京條約，天津條約——買辦階級底發生及其作用——中國底商工業與帝國主義
- 六 在中國東方底日本底勃興——中日戰爭與馬關條約——從此各帝國主義把中國認識清楚了——中國無能底暴露
- 七 俄國之必然東侵——過去的中俄關係——俄國覬覦滿洲底野心——西伯利亞鐵道之建築
- 八 德國底東來——牠底統一、發展、東來、與俄法威脅日本退還中日戰後底侵地
- 九 帝國主義要殖民地化中國——俄國借款事件——李鴻章與張蔭桓賣國底證據——租界、債務、鐵路等侵略政策
- 一〇 上層的改革運動——康有為論變法——戊戌維新——這個運動底失敗及其教訓
- 一一 下層的反抗運動——義和團之掘起——皇室、官僚底態度——義和團的暴動——八國聯軍底擄掠——辛丑條約

-
- 一二 帝國主義在中國建築鐵路底政策——銀行團之產生與作用——鐵路與中國產業
- 一三 由鐵路政策到鑛山、租借地之讓與——勢力範圍底形成
- 一四 帝國主義在中國開工廠就地剝削——中國資本主義開始發展——帝國主義與中國資本主義
- 一五 中國政權因帝國主義所加與中國底財政負擔而削弱——資本主義破壞農村底間接方法——農村底破壞和賦稅底增加
- 一六 土地佔有底形式——地主底來源與性質——農民底物質狀況

再版序言

這本書是歐洲偉大的政論家拉德克 (K. Radek) 底講演。初版名『中國革命運動史』。據作者底計劃，分上下二卷。上卷分析中國經濟政治，下卷分析義和團以後底革命運動。不幸這個講演自一九二六年底春天開始後，到一九二七年底夏天就停止了，只完成了上卷。革命運動本身底一部份，竟自缺了。因此我們改名爲『中國歷史之理論的分析』。

這裏我們要說的，就是這部書底長處在於理論地分析中國底過去歷史和近代歷史，並特別注意於變革——過去

底變革、近代底變革。他沒有敘述好多事實。要打算在這書中找材料是很困難的。但是要打算說明中國歷史，理解其經濟、政治、底性質，和各種事變底原因，以及中國社會進化底理論，那就不能不讀這本書。無論如何，它提供得有一種見解。

這本書在方法上是很正確的。作者用高級的科學方法來分析中國歷史，所以處處都表現出有新的光輝。整個的系統我們不必說，單以他對於秦始皇和元朝底政制、劉邦和朱元璋底興起、王莽和王安石底變法、康有為派底維新、……底理解而論，却是超出一般中外歷史家和社會史研究家之上。他屏棄庸俗的道德觀點，一律從具體的經濟背景和社會成份着眼。這完全是一本科學的著作。

另外他把帝國主義對於中國底侵略，描寫得很好。值得稱說的，就是他從帝國主義方面舉出了很多帝國主義有計劃地侵略中國、搶劫中國、底證據。他可以使像胡適那般連帝國主義都不懂得，因而爲其侵略辯護，底人，無法狡辯。至對於中國向來只是從中文著作中研究中國底歷史家、社會史家、政治經濟家，則指出了一個方法：研究中國應該讀外國人關於中國底著作。本書對這些人說來却又提供了一些可靠的新的事實。



歐洲資本主義開始侵入時的中國情形。

我們的研究現在要講的是中國的實際，它產生了中國革命與民族解放運動。現在所講的是歐洲資本主義開始侵入時的中國情形。那時候，因歐洲資本主義侵入的影響，開始改變了中國的社會關係；把舊制度破壞，而在實際的生活中產生了強大的民族革命運動。

中國同資本主義國家接觸的時候，是一個農業國家。因此，如果當我們同意，研究資本主義對中國發展的影響的時候，那我們必需求得解答的第一個問題，就是中國的

農業問題。但這個廣泛的問題，我們可以把牠具體的分成三個問題。第一個問題：土地私有制在中國存在嗎？第二個問題：當時私有土地是怎樣分配的，有沒有大批土地的佔有者？地租與農村工錢勞動者的存在？第三個問題：中國農業是自然經濟或者是早已捲入了商品流通的漩渦？當中國與歐洲接觸時候，中國經濟的商品化又達到了怎樣的程度呢？因為我們知道，歐洲資本主義侵入中國的影響有二方面：就是中國農村經濟的商品化與分化。

A. 土地私有制在中國存在嗎？

關於第一個問題——土地私有制在中國存在嗎？許多研究中國歷史的資產階級學者解釋得非常不清楚。當中國與資本主義國家開始接觸的時候，誰是土地的私有者？關於這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在資產階級學者的著作裏甚至於在俄國十月革命後的幾個俄國著作家的著作裏，都說得異常含糊。他們說，並且很肯定的說，在中國直到現在都還沒有土地國有制的存在。

關於這個重要的問題有三種作品是我們不得不研究的。第一本書是俄國研究中國問題的專家柴哈洛夫所著的『中國的土地私有制』（1854年出版）這本書是講中國農業發展的歷史最好的一本書。其次，是英國研究中國問

題會主席詹姆生所著的『中國土地問題與鄉村居民的狀況』（1888年出版）。最後，是法國研究中國問題專家法郎克著的一本關於農業上法律關係的書（1903年出版）。我不懂中國文字，因此，不知道有沒有比較這三本書再有價值的著作，但據懂得中國文字的學者說是沒有的了。因此，我們研究，必須以這三本書為根據，牠們相互間是有連繫的。第一本書是完全講歷史上的，第二本書是關於1880年代的中國農村經濟，第三本書，我在上面已經說過是關於法律方面的。

這三本書的內容是怎樣呢？柴哈洛夫說：『在清朝的時候，土地分為官有與私有兩種，但土地與從前一樣。除了因政變，土地私有者要失去土地外，土地私有制仍是絕對不可侵犯的。佔有無限制數量土地的，買賣與抵押土地——一切還是像從前一樣，隨各人自由的意志。政府的責任是保護土地私有制的安全，並且極力企圖使土地都可適宜於耕種，使沒有一塊土地是荒蕪的。在明末的時候，因為政局的騷擾不安甯，以致荒蕪的土地數量劇急的增加。清政府的政策就是極力減少這種荒蕪的土地，這樣，可以阻止農民的漂泊與遊蕩。』

從上面一段話中，我們可以知道，柴哈洛夫說過，就

是中國存在有無限數量的土地，賣，買，與抵押的權利。換句話說，就是在中國，除了幾個例外（關於這點，我下面再說）已有土地私有制的存在。

詹姆生的書可以分爲二部份：一般的與具體的回答，這本書的價值，是在他所說的不是沒有根據的話，而是有具體答案的。他曾很詳細的觀察各省（滿洲，直隸，山東廣東等省）土地私有的實際存在的情形。根據這種具體的調查，他有下面這樣的答案：『我們看，中國土地財產是否全屬於皇帝或是人民的？這個問題比較偏於理論方面，實際上我們對這個問題的解答同其他東方國家一樣，首先要看政府干涉農務達到那一種程度，再要看政府給農民處理他們的田地的權利是怎樣，多或是少呢？有的時候，還需看政府對農業生產品抽稅輕重而決定。如果抽稅是很重的，那末在實際上，耕種者所留下的有權使用的就很少，我們可以說，在這種情形之下，土地是屬於政府的，而耕種者僅僅好像是租地人罷了。

照一般的原則，中國當局認爲凡在太陽之下的一切事物都是屬皇帝的，土地是皇帝的私產，人民是皇帝的僕役。他方面，皇帝或政府是一切荒地與沒有主人可耕土地的名義上之私有者。這些沒有主人的可耕地是由于飢荒，

內戰或其他原因所致的。起初，在這些土地大概是由政府的各地方代表分給人民，而人民向政府納稅與繳納一部份的收穫。這種權利，在其他各國都存在，沒有絲毫的區別。在另一方面，凡土地在私人手裏的，那他就可以依照他自由意志去處置，他可以不受政府任何種的干涉，而自由出租抵押與出賣土地。至於土地賣買的條件，同賣買其他財產一樣，一般的土地稅達到生產總額二十分之一或三十分之一。這當然不是租額的全部。土地私有者他們自己是不耕種的，常常把土地出租，自己取得收穫的大部份，留下的一部份則繳納政府。

因此，可以看出中國土地私有者對他們自己的土地有那樣絕對的權利，完全同其他國家一樣。』

這樣，詹姆生的答案同柴哈洛夫所說的是一而二，二面一的，就是在中國同西方一樣土地私有制是存在的。

這種土地私有制有那幾種例外呢？第一，政府充公的未耕土地。第二荒蕪土地屬於政府。第三，江河沖積成的沙地也稱屬於政府的。法郎克教授，他證明上面說的最後二個例外在德國根據民法也是適用的。

第三本書，我在上面已經說過是法郎克教授著的，他解釋土地是皇帝私有財產的傳統之來源。法郎克說這是因

爲從前孔夫子關於土地問題曾說過這樣的話，後來散布到一般民間去。在詩經上說：『宇宙間一切事物都屬於皇帝，國家，每個百姓是皇帝的僕役』這種帶有宗教色彩的話，反映到當時由農村公社轉變來的封建社會制度。在封建制度之下，皇帝是法律上土地的私有者，但法郎克指出與當時實際情形不相符合。同樣也與詹姆生一樣說：『中國土地私有制的存在那樣完備，同其他任何國家完全相同。國家或皇帝土地的私有權利，也許僅能到那種程度，好像歐洲和美洲與其他國家一樣，那種沒有根據說中國是在特別情形之下，是不對的。』這就是證明說當中國與資本主義國家接觸的時候，土地和私有制在中國的存在，同其他國家相比，是一樣的。

無論怎樣，對於第一個問題的答案——土地私有制在中國存在嗎？我們可以回答說，是的，土地私有制在中國存在着。中國同資本主義國家接觸的時候，是土地私有制存在着的一個國家。在歐洲著作品中對於這個問題的一切記述都是錯誤的，錯誤的原因是因爲歐洲的那些旅行家與著述中國問題的學者，聽見說中國皇帝好像上帝一樣，具有極強大的勢力是私有土地的主人，他們就相信，毫不加以批評或證明就著作發行，有的時候，一般革命者把重要

的書不看，反去讀那些資產階級學者所著的與不正確的書。這樣當然關於幾個重要的問題，似在濃霧中一樣是不會了解的。

還有一點，我要提起讀者注意的，就是柴姆洛夫，詹姆生，與法郎克他們都知道中國文字，從中國文字方面搜索材料。而詹姆生是英國研究中國問題協會的主席，他是依據實際的調查，而記述中國各省的具體情形的。

B. 有沒有大批土地的佔有？

第二個問題我們應當回答的——是中國土地佔有的分化問題。據常平一般人說，中國是絕對的小農國家，沒有大地主的存在。

在中國大批土地的佔有存在沒有？這個問題在理論上有重大的意義，因為我們自己如要解釋：中國是代表什麼，中國官吏與站在他們頭上的皇帝是代表那一階級？那末很明顯的，我們急須知道：中國僅有小農階級嗎？還是大地主也存在呢？這是一個最重要的問題，這問題不解決，馬克思主義者不能解釋中國的歷史與在十九世紀發展起來的偉大的鬥爭。許多著作，即馬克思主義者的著作也在內，對這個問題一般的回答：是中國沒有大批土地私有存在。但詹姆生的書，對這個問題比較有詳細的實際的觀

察各省情形的材料，他恰恰是說中國大批土地的私有是存在的。現在我們把英國研究中國問題協會調查的報告，舉幾個例或者可以拿幾個證據來觀察一下。

最先，我們看在滿洲的英國牧師詹姆斯的報告，他這樣說，滿洲農民佔有土地平均每戶五至十英畝，也有很多的農家佔有土地十至三十英畝，在吉林省內有失農的存在，佔有土地達二倍以上，生活情形比較中國其他任何地方的農民都要好些。除了這個報告以外，詹姆生又報告說：在滿洲有許多土地的私有者，佔地一百英畝也有不少人，或是佔地二百英畝的。還有些人，雖然不多，但佔地在五百英畝以上，佔地一百英畝以上的人可以稱為富者，這是在滿洲的情形。

其次我們看山東省，牧師曼特希斯脫說：在山東沒有特別大批土地的佔有，但在他住的那縣裏，據曼特希斯脫計算有八至十之數擁有土地五百到六百英畝，還有一二人擁有土地一千英畝。凡有十英畝土地的，已算為佔有土地的中等者了。在他住的那縣裏，據他的意見，有百分之十的土地是租與農民耕種的，農民的夏季收穫的一部份（將過一半）作為地租。

在山西的牧師白克愛爾報告說：在山西也有大地主的

存在，大地主把土地出租，並且在農業上應用雇傭勞働。在山西的南部，有廣大的耕作場，地主擁有千畝以上的土地。他說：『三年前我旅行山西的北部，在那裏我發覺有些地主擁有巨量的土地並且在農業上應用雇傭勞働。』

在江蘇的英領事奧克孫卡姆報告：關於江蘇的情形最有趣味。他講到太平之亂的事件。關於太平之亂大家爭論的一個問題，就是農民要求減輕租稅是僅僅反對官吏同時也反對地主。奧克孫卡姆曾這樣寫着：『從太平之亂發生，江蘇大地主都消滅；有農民在北部則有大地主之存在。他們大部份的土地租給農民耕種不超過五十畝至百畝以上』這就是說，在以前有大地主存在，但在太平之亂爆發後，僅剩餘農民，而大地主被消滅了。至於江蘇的北部因為太平之亂沒有波及到那個地方，所以有巨量的大地主。奧克孫卡姆還有具體的數目與報告，但是我們在這裏不能把那些材料用來證明，如果讀者能願意，尤其是中國人對這些問題下科學研究的工夫，能從中國材料方面去證明，那是很有興趣的。奧克孫卡姆說：『大地主在揚子江南部極少，同樣的在靠近揚子江三十里的地方，大地主也不多。但北邊情形就不同了，大地主極多，而農民佔有土地極少。有一家姓陳的佔地四十萬畝 166,000 英畝，土

地的範圍不僅是在江蘇而且綿延到湖北安徽一帶。別的一家姓楊的佔地卅萬畝，同時還有許多地主佔地四萬至七萬畝。這些大地主都在江蘇的北部；但靠近興化與泰州的地方，也有大地主佔地千畝到一萬畝的。太平天國差不多把沿清江居住的人民完全驅逐，打毀官廳，把一切文件記錄等焚毀。在江蘇北部的縣知事等則受害比較少些，舊的家戶仍然保存自己的土地。而在揚子江南部的土地，從1865年後，已是新的一批人民耕種，經過幾多年代，他們在事實上早已得佔有土地的權利，並且免除對土地的付款。當然在這些情形之下，只有貧窮的農民可以用自己的勞動來生活，同時他們佔有的土地也是很少的。

在這些報告裏，奧克孫卡姆將小的，中的擁有極多土地的大地主的情形詳細的告訴我們了。

這樣，我們雖然不找中國文字方面的材料，但從這些報告中可以知道，就是在十九世紀中葉與末葉，大批的土地的佔有在中國是存在的。

牧師包特愛，他在湖北省做工作報告說：依據湖北省的情形，在三百畝以上的，可以說佔有大批土地的了，甚至佔有地二百畝以上的就能稱為地主。此等地主在湖北不少。浙江省的報告也同此相彷彿。

現在不再引用例證，使讀者麻煩，根據詹姆生的調查來研究已是足夠了。

因為他們的報告雖不是正確的統計，而都是實際的可靠的報告。因此很明顯的根據這些材料，我們不能再相信說，中國沒有地主土地的佔有；也不能再相信說，地主佔有土地沒有什麼作用。在事實上，各省都有大批土地的佔有，我們看了詹姆生的報告，再不容有什麼懷疑了。

在我們來研究農民的情形與農村經濟的商品化達到何種程度之先，我們必須先把一個問題來解決，這問題就是中國地主的土地的來源是怎樣的？大概都是下面的幾種來源？第一，皇帝賜給與貴族與武士；第二，一部份官吏搜括而來的土地。他們用收集租稅的方法搜括農民巨量的財富，租稅的一部份作為他們私人的收入（將來我們還要說到租稅制度）第三，就是被商人收買的土地。因為這三來源產生地主階級。

地主的土地，不是他自己去種耕的。地主離開鄉村，這種現象在幾個資本主義國家裏也是具備的，不過在中國比較特別顯著罷了！地主自己或完全不耕種土地，或者耕種一小部份。但大部份的地主都是在城市裏住着那華麗的大夏屋子，把土地租給農民耕種。又據詹姆生的調查，農

民交付地主的地租大概是主要的收穫之一半。除了地主與農民的土地外，在十九世紀以前，中國還有旗兵與軍人之土地之存在。柴哈洛夫很肯定的說，在明朝有七分之一的土地，在十八世紀有二十分之一的可耕種的土地都屬於軍隊的。但經過某時期後，因為各種原因，軍隊的土地漸漸轉到農民的手裏。同時因為商品經濟的發展，滿州旗營所佔的土地也漸漸的喪失。他們開始把土地抵押出賣，柴哈洛夫說，在十八世紀開始時，政府想保持着自己武力的物質基礎，提出巨款將滿洲的軍隊司令出賣或出租的土地買回，到十九世紀中葉，政府的這種企圖漸漸失敗，在十九世紀末葉時，旗民與軍人佔有的土地，差不多完全喪失了。

在上面，我們差不多把歐洲資本主義開始侵入中國時土地佔有的情形說完了，接着要說到的就是農村經濟商品的問題。以後我們還要更詳細的研究十九世紀初與中葉的中國社會關係。



十九世紀初葉與中葉的中國農業狀況及其經濟發展大概的情形和問題，都解答過了。

關於這個問題，有些馬克思主義的信徒，有時都誤解

了，譬如考茨基於 1889 年，在他所著的『中國與歐洲』一書上面確定的說，中國停滯不進步的原因，主要的由於牠與資本主義世界接觸後，在各方面，仍保存有自足的農民公社經濟，——假若不是所爲共產主義經濟的話，這種經濟，是爲滿足一切自己需要的『大家族』範圍所限制的在中國生活的內部的很深處，既是不曾變遷民衆都以自然經濟爲生活，一切必需的物品，都自己生產，統不需貨幣，又不需要他項經濟的生產物，那末，還有什麼能不現于中國生活的表面呢？

然而，事實上，我們已經看到土地的私產，在中國已經有了；農村的分化，（地主，農民——私有土地者及僱農）在中國已經有了；大量的雇傭勞動，地主及私有土地者，又皆雇用了。凡此事實，都足以證明考茨基的答案是不合實際的了。抑更有說者，關於這種幻想的觀念（說中國在十九世紀末時，還盛行自然經濟，及爲當時中國社會基本組織的『大家族』）我們有許多證明，不特在十九世紀，就是在基督教的全盛期中，貨幣經濟，在中國都已經發展了。自從耶穌降世以後，中國就有了貨幣——不特有金屬的而且有紙的。或許可以說，在元朝（1260——1368）蒙古入主的時候，中國又發生了封建制度，當時馬克波羅在

中國曾見了許多封建諸侯的城堡；在這個時期，貨幣經濟只限於封建社會的上層，而未深入於農村，至於商業，也不過是對外特盛而已。然而這也很明顯的，在十九世紀，中國非有商業，以供廣大民衆各方面的需要是不可能的。

在封建制度發展之下的商業，首先要滿足貴族的需要（主要的就是奢侈品），而這些商業的中心點，也當設在那些住有貴族，修有城堡的行政中心。中國十三世紀的商業，同樣的也有這些奢侈品，為當時的商人會把波斯，亞拉伯的織物，丹麥的銅，都運到中國來，但是中國十九世紀的商業已經不是中世紀的商業了。

例如在歐文書籍上，常常發生一種辯論——如上面所說過的——在50——100年以前，中國究竟有地主否？那末很明顯的，為時雖有地主，然而，已不像在封建時代的樣子，他們不佔優勢了，他們不是經濟的主要組織者了，商業的狀況也不是按他們的需要而決定了。

固然，設若我們有十九世紀商業狀況的著作可攷，但是我們可以比較從各方面所得的材料，來虛擬一幅圖景。關於這類的材料，我特地選擇『由華來的信札』（私人的日記）。這日記是一個德國有名地理學家記的。他的名

字叫做莉息太哥芬在60—70歲上，他曾到過中國游歷許多年。在他遊歷以後，他關於中國地理方面，給我們留下許多著作。（註）

（註）『中國社會的關係』五冊，『信札』兩冊。

假如我們把他關於中國城市商業的描寫，關於商品運輸的描寫，從頭看一遍，那末我們所見的是些什麼呢？在運河之道上所運的是些什麼呢？在鋪石的大路上所運行的是些什麼呢？我們可以找到有下列的商品：從山東及山西來的鐵，從中部南部來的棉花，此外還有煙葉子，糧食，食鹽等等，這都是莉息太哥芬當時在中國內部商業上所看到的主要商品。

說到中國人完全都吸鴉片煙的話，莉息太哥芬給我們一些材料，他說中國人吸食鴉片煙者，多係城市中人。中國農民是不吸鴉片煙，因為鴉片太貴，他們見了吸鴉片的人，還表示非常討厭，至於當時商業的物品，大半是借給農民羣衆及城市居民（手工業者，小商人等等）消費的生產品。

中國農民的生產，不僅是爲自己消費，而且要去換錢作爲完糧納稅之用，去買那些爲農民經濟上所必須的物品，如鐵器，棉花等類，這是我們從莉息太哥芬描寫中所

知到。

至於講到中國農民經濟，捲入商業之中，以及商業成了農民的市場一層，我們看上次用以解釋中國自佔據土地很多者那個表，就可以證明了。詹姆生答案的特點，就是那些著作家——多半是英國的傳教士——所給我們的智識，都是關於中國農民經濟中主要產物的價格。這些智識都是很正確，很詳細，而且言之殆盡的。所謂那些主要的產物，就是米，麥，粟米等等。當然這些產物，要是在市場上常常沒有，農民也許就不能作事了。差不多在中國全國，各省或多或少我們都見有用錢佃田，佃地的現象，既有這種現象，至少也免不了把一部份之收入交納錢糧。我們知道，在許多區域裏（如廣東，湖北，江蘇，山東等省的各區）很早就有了各色的市場交換——如棉花，煙葉子，絲，罌粟，以及蔗蔗之類。從中國各省來的人們告訴我們說，各處農民土地的價格，高低不等要看該地的運輸便利與否而定。他們告訴我們各種農產物價格的數目，如棉布農業用具以及糞尿肥料之類，各有各的價格。關於中國經濟商品化範圍的擴大，我們還有一件很正確的事實來證明，就是中國政府購買大宗糧食屯倉一事，俄教士伊亞金夫著有一本很好的書名叫『中國與其居

民的道德，習慣，及其文明』出版於 1840 年，在這本書上我們找到特別有興趣，而關於糧食倉一篇，（中國人民存糧的方法），在這一篇中，我們看到有下列的情形：政府收土地稅的時候，一部份收的是錢，一部份是自然生產品——糧食。收來的糧食，政府就存在國家的倉內，以備凶年，同樣，農民也積聚些糧在鄉村的倉裏。關於國家的倉，伊亞金夫是這樣寫的：『管倉的官吏，是看管糧食的，平時他可以低價出賣，秋天他再買回新的糧食，這樣，就可以把陳舊的糧換成新糧。

存在各省御倉的糧，賣的數目，只限于3%。屯子倉內的，總要有7%。然亦看各地的情形如何，有些地方，可以賣過5%，甚至有可賣至9%的。但在來年時，可不能賣過5%，或頂多不得至3%，通常，倉糧的價格，在來年要比市價低在 5% ；在荒年要比市價低10%，在秋收以後，管倉者，必須要以所賣的錢，完全買成新糧填補于倉內。』

（註）在他的『China』由387頁至288頁上，著者伊亞金夫給我們材料很多，甚至管倉者每年買糧與賣糧數目的多少他都能使我們計算出來，因為他在他的著作上，要製各省的國家倉糧的數量表，據他新定的，全國御倉的米，粟米，以及麥子的大概數

目是：41,039,901 袋，每袋 160 格尼（即每袋有 5 普德，每普德合四十磅，約中國卅幾斤，又 32 18/10 普德。）所以在來年的時候，管倉者能賣出 20——40 百萬普德之多，而在荒年的時候，即可增至 100 百萬普德，或可更多，這就是說，農民要把一部分的糧食送到市場上去，而這一部分糧食是足供市場之需要的。

還有，我們知道，專賣鹽在國家財政上，有什麼作用呢？我們即可看尼亞金夫是怎樣說的，他關於資本積累的來源，所談的話如下，

中國私人最富的，多係商人。而特別多是些擁有鹽業的人——其次就是于香港有關係的私有財富。在這第一個商會中有個潘克維（Pankekffe），他的財產，據說有四百萬兩或六百萬兩之多，

（註）上面所引的這一段話，在伊亞金夫的『中國』（338—339頁）。這一段話的本身就是克魯森師吞答覆威爾士特的許多答覆中之一個答案。伊亞金夫把這答案文又用其他資本家——特別是北京的銀行家的事情來補充了；但是他對於克魯森師吞的話，可說是沒有衝突，

這一段話有什麼意思呢？這個意思就是他給我們指明

了一個資本積累重要的來源（比外香港所有的國外商業還重要，）而國家收入基礎，又是建築在農村買鹽能力之上的（因為消鹽者主要的都是農民）。此地我們應當了解而不要誤會的，就是農民一切的生產，並非都是為市場的。中國農民，同一切資本主義未發達國家的農民一樣，他們生產的一大部份，還是他們自己消費了。但是中國農業同市場的關係是緊相連而特相連的。如莉息太哥芬在許多地方所指出的。中國農業與市場的關係，較之歐洲經濟落後各地，實是更密切的多。譬如莉息太哥芬關於十九世紀的巴爾幹農民曾說，他們與市場交換關係之密切，遠不如中國的農民。關於中國農業及農民社會組織的狀況，到過中國的旅行家，有許多誤會，因為他們沒有注意到經濟狀況，同農村及其舊經濟組織所反映的政治形式的區別。譬如莉息太哥芬說，中國農村的德謨克拉西，其他任何國家都是不會有的。若克著有『中華帝國』一書出版於1854年，當時人都以為是關於中國很重要的著作。他給我們有下列一幅關於農村德謨克拉西的圖畫：管理農村如同管家一樣，他們有爭辯時，不由國家的管理，而是受他們家族中年高有德的父老管理。同時這些老者又對於國家行政者負責，而這些行政者即藉這個農村德謨克拉西的

機關，以便於收稅以及執行政府的政策。至於農村內部所發生的一切事件，政府則認爲該村鄉老爲完全負責者。

（註）『在遇着向收稅官吏交納錢糧的時候，各個農村去接洽事件全是連成整個的，每一村之首有一個村長名目（鄉約）。他是全村共同選舉的，這種完全合法的組織，在全世界各國公社中，恐怕是沒有的。這些鄉村負責任者的選舉，與國家官吏完全沒有關係，在他們選舉的時候，這些官吏，不能提出來，也不能影響妨害他們的選舉。本來全村莊的社員都有選舉權與被選舉權，但在實際上，被選舉的人常常是些年長有錢的受鄉里敬重的人。這些村長，因爲我們常常有事去找他們，我們就不能不知道他們一村鄰被選舉，就是很有身分的了。至於他們受任的期間，是按各地而異的。他們的職務，就是警查；有時或越過職權，在村與官廳之間，他們就去當中間人。（若克著『中華帝國』97——98頁）這樣，所以經濟事件上，各家是各家的，而一當官廳之前，就完全成了整個的。

如同在俄國，公社經濟，早已消滅，而各農民早都單獨的進行他們經濟了。然而公社還是存在，以爲國家行政

便利的機關。在中國也是一樣，在鄉村的政權必須要經過農民所選舉的人，而這些人又必須是各家族的長者。許多考查者以為中國在十九世紀時，還有土地公有的現象，其誤會的原因，就在于此。但我們知道，實際上公有土地在中國已沒有地位了。

如果我們要問一問自己（考茨基就發生這個問題）為什麼中國經濟發生這樣慢呢？那末這個問題的答案，我們就不須去農村裏找，說他是落後的，原始的，而要去中國手工業及製造廠所在的城市裏去找。

在我的以往的著作中，我已說過馬克波羅對於十三世紀中國手工業的狀況，是怎樣描寫的。他曾這樣說，他給我們一段正確無疑的關於手工業狀況的敘述：他說中國十三世紀手工業發達的程度，比當時歐洲最好的手工業還高（如在威宜士米倫，以及其他意大利各中心地的手工業，意大利應當算是資本主義最發達的國家）。

我們要是把十三世紀的手工業看一下，我們就知道，不但中國皇帝胆敢向英國領事馬克特尼說，無論你們的什麼東西，我們都不買，我們都不愛，因為我們所生產的東西，並不比你們壞云云；就是一連許多旅行家，他們把十三世紀的中國手工業，同當時在工業革命開始之前

——歐洲的手工業相比，也同有這個意見的。

此地相同之點，不僅是外部的或純然技術的同歐州的一樣，中國當十三世紀時，手工業發展不特到了極點，並且超過了它存在的限度。在中國，中世紀手工業關係的破壞，恐怕比歐洲還更厲害。極而言之，伊西金夫已經給我們確定了；當他生時，行會制度在中國已經不存在了，所餘的一點痕跡，不過使人憶起當日的行會而已，其實就是行會的名稱，也失其意義了。

『在中國行會之存在，徒有其名』手工業者在每條街上，到也常常作一樣的手工業，有時他們又舉行他們相傳的節度日，然而寫的與規定的章程是沒有的。中國手工業不特表現出分工已達到最高程度，專門化的程度已深，而且在這專門化的基礎上，他已經走到手工工廠的領域中去了。此地我們可以找許多著作家來證明，譬如我上面已經說過的若克及莉息太哥芬等，他們有許多關於中國的手工業的描寫——如關於磁業，紡織，及綢緞等，給我們指示出來，中國手工業之精巧，毫不亞於歐洲之手工業者。莉息太哥芬甚至於說，中國手工業的技術，已到那樣的高，至於每個手工業者，都為他自己置一架自動的工作機子。說到中國手工工廠分工之細，較之歐洲就高的很

多了。普通的例子，就是磁器的製造。每個中國磁廠，都有他自己的特別專門技術，而此外又分有許多部門，在特別製造某一種磁器，譬如十九世紀所設的大街磁廠，就分有二十二部門。在每個部門，均有嚴密的分工。『每一工人』若克說，『都有他的特別技術，有他的特別巧處，這一個人畫鳥；那一個人畫花；這一個人加紅顏料；那一個人上藍顏色，計算起來，直到製造好出賣的時候止，每一件磁器，要經過五十個工人的手。』

（註）見343—345頁

很明白了，一個工人把這五十樣動作中之一種動作做一生世，他對於這項技術，當然很高，而作的是很快的了。

除手工業及手工廠外，中國還有在家庭受收買商人的命令而工作的『家庭工業』，當時中國的半農民半手工業者，完全都在商人掌握之下，商人把原料供給他們，又把他們所生產的物品買去。我曾引用俄教士伊亞金夫的話很多。他是關於經濟問題，尤其是關於銀行，百分數等問題很有興趣的。在他回答克魯森師吞的問題——中國從前究竟有工廠，或在家庭工作的生產？並且老板，學徒，工匠之間有何種關係？——上，他把在他之前旅行中國者的觀

察都更正了。

『繅絲及紡織品，都是在家庭生產的，但多半是受資本家的命令，由資本家供給他們的原料的，農村居民的日常職業，祇是預備原料。原料預備好了以後，繼續完成這種生產，他們是沒有能力的。』

（註）伊氏的『中國』第四章克魯森師吞

（註）『問題的解釋』第350頁全章就是他批評克魯森師吞由廣東英人所得的不正確消息的一個註子。

一部份農民先預備原料，預備好了，收買商人然後來一齊買去，再交給其他農民，使他們繼續製造。

伊亞金夫說：當他活的時候，中國會有許多種大的小的『工廠』（多半是手工工廠）。如廣東的磁器製造廠，及南京，蘇州，杭州的絲綢廠。此外我還希望讀者注意到高會司的新著作，書名為『中國的五金工業』，1923年出版於天津。在這本書上，著者根據中國的材料，給我們有中國在與歐洲資本主義接觸以前的煤業及五金工業的概狀。高會司給我們指示出來，中國不僅有紡織綢的工業，而且有『重工業』。由此我們看到，中國從前的工業是很發展的，歐洲所以能夠超過這個限度而能再向前發展的，只是在應用汽機之後。

現在留在我們面前的一個問題，就是當時中國手工業工廠爲什麼不能往前發展到近代的工業？換言之；這個問題，就是爲什麼中國沒有人發明汽機？這個問題是給那些碎分髮毛的人的問題，我們必須了解的就是現代的機器，可以說是在英國發明的。爲什麼不問，德國人沒有想出蒸汽機的製造呢？顯而易見的事，近代機器製造所以發明於英國，實有他的歷史條件。（關於這點，我下面再說）——中國人爲什麼沒有發明機器呢？他們同英國而外同其他各國所處的情形是一樣的。

英國由手工工廠，變遷進步到現代的工業，有沒有什麼特殊原因呢？

假如我們看技術的歷史，我們就可以見到，企圖變到機器領域來的，實有三個國家，首先，在中世紀末的，就是意大利，我們知道，天才如梁諾夫的腦經，是怎樣在技術上思來想去的。這種現象，當然，不是無意識的，不是偶然的，這是社會由手工工廠領域中搜求出路的表現。第二個國家，就是荷蘭。第三，就是英國。在英國才把這個問題解決了。

爲什麼只是于這三個國家中表現，有超出手工業技術界限的企圖，而其他各國都是沒有呢？

因為這三國都是海上的國家，他們都是靠海上商業及殖民地的搶劫爲生的，在這些國家之中，是產生大批的生產品的，但這種條件，惟英國最好。因為，我們知道的，自從亞拉伯人及土耳其人，先後把地中海與東方的關係割斷時，意大利的作用就終止了。荷蘭呢，版圖未免太小了，天然物產力也就太少，實難擔負廣大生產品技術的使命，使生產力非常的加緊提高；這是要有很大的積蓄久長的搜尋的。英國則不然，版圖很廣大，礦產財富源源用之不絕，而且當手工工業發展到極盛的時候，英國就競爭到了東印度。

中國是地大物博的，遠在十三世紀時，它就照這三國的方向走了。當時佔據全亞細亞者，就是蒙古民族；當時中國的貨幣，可以由太平洋流通到波斯灣以及裏海各地；當時全亞細亞的商業引起了中國商業資本很快的發展以及手工工廠工業長足的進步。但蒙古統治一崩壞，鞏罕、謨德崛起，印度被占領，波斯失陷，於是亞細亞終于瓦解，而廣大的市場，就隨之分散了，中國的商業資本不能在全亞大陸之上通商了。海外是無處可走的，廣大無際的太平洋，當時使中國發展商業，以致中國的貨物，由與海平行的運河運輸，因為在運河運貨，較之駕舟海上，冒波濤之

險與海賊相通，時有全船被搶的危險，實爲賤而且方便。總之，自元朝滅亡之後，中國的幼稚資本主義（因爲農民的勝利以及封建制度之廢除，就是把封建貴族朝廷的消滅）的一個最大的內地市場，就消滅了，中國商業只得被封鎖於中國本國以內而與其他外界的市場隔絕了。自此以後中國手工業的工廠，差不多就完全停在十九世紀中葉所發展的水平線上，沒有一點進步的情形了。

很可笑的，有許多人說，如資產階級的學者維平及俄國的瓦耳加以爲中國經濟所以不發展，是因爲中國沒有自然科學的發展，這完全是笑話，資本主義的發展，而是在某地方有了資本主義的發展，有了自然科學的需要，才有自然科學的發展。同樣的可笑，有人說中國所以不能發展到資本主義，因爲中國沒有強力的政府，去強迫農民去工廠裏作工。資本主義並不是在強力的政權基礎上造成的，而強力的政權是建築在資本主義基礎之上的。況且中國的政府已經很夠強了。譬如滿清入關，雄據中國北部把十四年的農民暴動被他垂手壓平了。許多相繼而起的農民運動也被他壓服下去，而繼續把農民盡量的剝削。所有這些理論，都是與中國農村分工及工作的緊張的實際相反的。所以要解釋中國不能由手工廠進步到工廠資本主義的

原故，決不在中國沒有強力的政權與缺乏自然科學，而主要的因爲中國商業資本範圍太狹，中國不能有殖民地的擴大。

因此之故，所以在十九世紀中葉，我們找不到一個特別工業資產階級。一切手工業，都在小的經濟主人之手，手工廠也在商人之手，當時商人階級，就是中國資產者之代表，他們發展到那時候，就不能前進了。

然而要說中國只有小商人，那也未免太錯誤了。我們可以把中國運輸的機關總計一下，大宗的米，棉花，鐵，鹽，及糧食，不斷的運行，且其運輸不特是在國家權力幫助之下，強迫農民來運載，而是又有商業資本的工具的。那末，我們就知道中國有很大的一個階級的人，他們把多的資本，積聚起在他們的手裏了。

關於這個問題——中國什麼地方有大市場——並有若何之大？——克魯森師吞從國外商業的海口說起，回答說：『一切大城市，都是國內商業及本省手工廠屯貨之所，特別是在大江運河一帶的大城』『在各海口之間，差不多到處都有商業。』伊亞金夫以爲『這個答案是滿意的』並且又說『中國臨時的市場，要算稍大的各地方』『一般普通市場及小市場』說到大的市場，他說就是許多大的

屯貨的地方，就他們商業的大小說，假如商品的交換，是集中，不是單獨一方面的，他們就可叫做大的市場』
(註)

(註)他的著作第 345 — 246 頁。

此地很明顯的給我們指示出來了。除各地的小商業以外，在全中國範圍之內，還有很大的商業。

商行當時差不多完全分散了；因為在這商行的胎中，個人的資本滋長起來了。固然『茶及麻都積合在指定的舊地方，在那裏大家會議評定價格，此地的價格一定，各地方的茶麻，都要照這個價格出賣』但是我們舉個例子看，廣東的商人，本來只是廣東十三行的代表（各行的首領），而且實際上，他們顯然成了壟斷的經理人，『把一切其他商人的財富，都括到他們自己的囊中去了。』

這樣看來，中國當時之有個別大商人及商業資本發展之高，是毫無疑義的了。

這件事實，把中國信用券的發展，同時也證實了。除了英人的著作以外，我們現在有一本中國人的著作。此人的名字叫做谷肅禮。這本書是關於在中國國內流轉的銀行交易發展的形式的。谷肅禮在敘述中國信用機關之發展，及信用券之流轉等時，把伊亞金夫所說的關於銀行事

業狀況主要的現象，完全證明了。伊亞金夫說：『在一個北京，就有二百個私立銀行，（錢莊）最小的銀行，（錢莊）所有流轉的鈔票，也不少一百萬元』這些銀行都幹些什麼呢？這是很有趣的，第一，商人自己不自己把大批的錢由這一個城市帶到那一個城市裏去了。他們把錢交與大業城市的銀行，去取支票，賣貨的時候，他們並不拿現錢，而拿的是某個銀行的交易券。這些交易券，不特適用於那上面所寫的銀行，就是與這個銀行有關係的銀行，也是接受的。從此，我們就可以推想到，當時商業流通之廣，及商業資本作用之大了。

關於中國商業資本主義發展的程度，我們也有不少證明。商人設立有私人的郵局，運輸局及個人的簿記。在商店及小舖子內，他都懸有時價表，關於這點，人民商務委員會委員說的很詳細了。

中國的資產階級，不是統治階級，因為他們不是專制皇帝者。十八世紀法國的商業資本與菲律賓大帝時的德國商業資本，雖然已開始在國家經濟上要成統治的勢力，然也未直接指揮政府的政策。中國的商業資本有很大的商品價值來說，他包括了全國的經濟，他成了中國統治勢力之一。這些智識，雖然根據的材料很少，然可是確切的無疑

的。至於中國貨幣商業資本，究竟怎樣大，我們沒有一個準確的觀念，因為關於這些，我們得不到任何統計表；但是我們可以知道，譬如說，中國政府曾許壟斷廣東對外商業的廣東商人（十三行商人的首領潘克維他就有）據克魯森師局吞說，四百萬元，而且克氏又補說，這個數目還是少的，因為中國恐怕負擔重稅，不願把他的實在財產告人，無怪乎，熟悉世界如高不登（英國自由黨的首領），在講演鴉片煙之衝突時，對於潘克維都要行一所謂「商業上最尊敬式的禮。」

很可想見的，香港之商人組織，不是從天空墜下來的。他不過是中國商人組織最大者之一。據克魯森師吞的意見，就財富言，中國最富者為鹽商，其次才是銀行的商人。這些大的商店，都從那裏來的？他們的資本是從那裏來的？一切這些問題，伊亞金夫給我們寫的很好：

『中國極富的人很多，其中資本家也很不少，這些富人，是官吏而大半則係商人。他們的財富，就是土地，房屋及現有資本為錢與商品之類』……他已說了些我們已經知道的銀行的事，末後他又說『和中國一切土地，都是私有的。無論在那一級人，每人都想有一塊土地的資本，因為這種資本一定可以得到入款。而且在這裏的資本，一

切意外的危險（政變也在內）都不會有的。但是據有土地的人，不是被稱為地主的。」（註）

（註）（伊亞金夫著『中國』339頁）

這裏，我們所見到的是什麼呢？一方面在國內的進行的是商業，貨幣資本，都積聚起來。尤其是在旱水災荒年的時候，一部份貨幣，資本要積在受人指揮的家庭生產及手工工廠裏，而積累貨幣于商人的手裏的程序，特別加快。這樣積累越快，市場就越發展，而商人就越快的把他們的貨幣投在土地上。在另一方面，一班官吏也在民衆中括些地皮，去作同樣的事體。一方面置田買地，以保障他們的社會地位；他方面把一部份入款投在商業上去營利。

這就是中國經濟狀況的一副大概的圖畫，這一張圖的基礎，就是我們所佈置一些較為清楚實在，而不很多的事實，而不是那些通常的旅行家及表面的游覽者可能給予的消息。我覺得，頂好是讀者都去找些證明的材料。藏在淺膚的材料的一切中國經濟實況的怪物，一見我們注意到有思想而嚴重的觀查者的指示，就鳥飛獸散了。

從此我們可以預先相信，中國之有國家政權及階級之存在，是很明顯的事實，——只要我們能把我們關於中國

國家的觀念，從幻想的暗幕中解放出來。

在以後我所要研的，就是要分析中國賦稅制度，政權組織，及國家行政等，到那時我們就可以見到那些以爲中國政府好像是超階級權力之上的錯誤。在這些分析的時候，也許我們可以發現出中國有許多自己的特別現象（因爲中國經濟的發展特別停滯過的）但是中國的政權及社會構造的特徵，及那些一切的商業資本（非工業資本）仍盛行的商品經濟國家的政權及社會的組織，特徵是一樣的。

三

歐洲資本主義侵入的時候，中國社會制度的大概情形我已經說完了。我們可以看出十九世紀中葉，中國社會關係與西歐各國在未發展到現代工業以前的社會關係沒有什麼原則上的不同。我們看到小私有制度的農業國，因爲受了貨幣經濟的影響，定要發生分化的過程，這種分化形成了貧農與富農，形成了大地主，商人，商業資本家與城市貧民到她在手工工廠作工的工人在私人作坊裏作工的手工業者。現在我們應當討論的，就是關於國家政權性質問題，這種政權反映到中國各朝代的變遷一直繼續到1911年革命前滿清的官僚政府爲止。

假如估計中國的社會關係，我們聽到很多不同的虛構偽造等類的話，其原因是因為西歐不懂得中國話，（即有些極少數人懂得中國話的，他們也多半在離海岸遠的地方經過些極短的時間，少有傍海經過的）因此一切西歐的著作估計政權性質都完全出于空想。簡單的說，假使現在孔子的學說在中國已到崩壞的過程中，那末在西歐一切論中國的著作裏，孔子對於國家政權性質的觀念，都正完全是統治着，我們在歐洲敘述中國問題的所謂科學的著作中，時常可以找到那些正統派的孔子門徒，但在中國也許早已沒有了。

我現在僅就歷史理論的著作來說。

讀者有懂德文的，我可以介紹一本著作給讀者，這本書是代表資產階級的德國社會學家維貝爾所著的。在這著作裏提出中國政權性質及與西歐差異的地方，相同的地方，大半是講述關於孔子的，但中國歷史的一切主要問題都包括在內的。在這著作內，著者完全站在孔子的會話之基礎上，他說中國的政權是超階級的改權，有學問的，官僚的政權，這樣政權並不在保護任何階級的利益。維貝爾教授以其所有的材料希圖詳細證明此點。

這種觀點不但資產階級的學者維貝爾是如此，就是俄

國世界經濟學家凡爾加也是如此。在他關於中國革命的著作中，這樣的寫着：我們以為中國本國的資本主義不發展是由於下列各種原因：第一，沒有一個強有力，建築在壓迫工人上的，為資產階級服務的政權。中國中央與地方的政權是由於調節水道，防止水患及灌溉田畝等的需要而發生的，因此中國的政權——是為和平目的而發生，而並不是像歐洲那樣君權同諸侯及城市武裝的資產階級爭鬪而發生的。因此疆土廣大的中國特別是去建築長城之後許多地方都因為外戰的結果而變成荒蕪；然即在這些時候，中國國家的政權完全是帶有和平的性質。結果在中國組織了一種特殊形式的統治階級。這種特別形式在歐洲是沒有見過的叫做士大夫階級』

凡爾加在他著作中的這一段說的是什麼意思呢？

(一) 國家政權並不是由於階級鬪爭建立起來，而是由於為灌溉田畝和自然爭鬪而建立起來的。

(二) 國家政權不是由戰爭起來的。

(三) 國家政權不是壓迫人民的。

照這種著的一般內容看來，凡爾加不過是重複維貝爾的評論。就是說中國的官僚是代表一般智識分子，並不與任何階級有關係。他們保護國內的共同利益，灌溉全國，

建築堤坊與開闢河運等等。我已經說過這是孔夫子的觀點。凡是知道孔子學說的，知道當代關於孔子著作的，以及知道那些傳播關於中國官僚政權存在的觀點的，都可以看到凡爾加與維貝爾的觀點，不過是完全重複罷了。

我現在僅舉孟子上的一個例就可以完全明白了。我們知道孟子他討論與提出關於一般的國家問題比孔夫子更要廣博些。

我所舉的例子中注目的地方，恰恰是關於國家政權一般性質的。這個注目的地方是在孟子第三卷，在此卷內孟子與從別的侯國來到滕國的地主們——也是些學問的人們談話；這些地主們到這很小的滕國，因為聽說滕國有個很好的君主，所以特來訪問的。

這些學者來到這幸福之邦並驚問孟子而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饗殮而治，今也滕君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

許子曰：然。

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

曰：否，許子衣褐。

許子冠乎？

曰：冠。

曰：奚冠？

曰：冠素。

曰：否，以粟易之。

曰：許子奚爲不自織？

曰：害於耕。

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

曰：然。

自爲之歟？

曰：否，以粟易之。

那時孟子就說：以粟易械器者不爲厲陶冶，陶冶亦以械器易粟者豈爲厲農夫哉？

且許子何不爲陶冶舍，皆取諸其空中而用之？

何爲歟？然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

許答曰：『百工之事固不耕且爲也』

孟子曰：『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爲歟？』

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百工之所爲備，如必自爲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此天下之通義也』

孟子創造的理論，說國家的政權是勞心者的政權，這政權必須幫助人民維持秩序，不如此社會工作就不能做。孟子又說，國家政權之任務，不是階級鬭爭，而是與水鬭爭（同樣的，凡爾加說的也是如此，不過他在二千年後說的罷了。）

他說禹之治水功績極大，因為中國皇帝治水之工作，才使中國國家富廣。這樣，我們可以看出，資產階級的科學，甚至於馬克思主義者所力擁護的資本觀念，完全與孔子的學說相符，但孔子的學說創造的時代，還在封建社會發展之初期，那時期國家機關與官僚是成整個的集體，而不是有單獨的官僚的。

如果我們很注意的分析這種理論，真是非常好笑的，也用不到很仔細的去考究過去的歷史，只要根據我們在上面所引用的那些事實便夠駁倒這種理論了。中國社會的階級鬭爭，不是在資本主義發展時才開始，在原始社會崩壞後就開始了。在中國的著作中有極豐富的歷史文件反映實際的階級鬭爭是很明顯的。根據這些歷史文件，我們對於中國國家政權的性質問題便可完全明白了。

現在先觀察中國國家之發生，有許多地方我們又不能不重複往日所說過的，但這是必要的，因為中國官僚不是

產生於清朝的政權之後，清朝不過是繼續以前封建時代，各前朝的淵源罷了。

究竟國家政權之產生與洪水鬪爭有什麼關係呢？當然，這個問題是極重要的。當中國人耕種的時候，首先的任務就是與洪水鬪爭，並且毫無疑義的，國家政權對此並不是暴躁，因為有方法來調節灌溉的問題。就是在這個基礎上有了很好的時機產生地方政權，這在其他國家也可看到地方政權的職務就是用人工灌溉田畝，但在中國決不能說也像古代埃及一樣；在封建時代因徒找到了灌溉的方法即促進了統一國家的過程。這就是埃及與中國灌溉性質的不同，也用不到說中國國家的政權是建築在廣大的灌溉的田畝上等等的话了。

如果拿政權也是因階級爭鬪產生，而政權也不是一時集中的，拿古代埃及來比較一下，那我們就可以知道埃及歷史是靠傍着一條河而發展的。這條河為供給全國土地之水源，因為要調節水源，所以需要發展到極高度的技術與天文學等。這在埃及古代歷史的時候便知道應用了。但因為不能調節從深淵的尼羅河到河上那一部份的地方的水源，因此在埃及的歷史中我們就看到爲了要調節埃及水源的保證，所以埃及國王的政權就必須擴張到尼里河區域的全部

。在我們現在的時代——吉養那企圖攫取阿比西尼亞，他在實際上也是應用從前埃及國王所應用的方法，埃及只有一條河通全國，誰佔有這條河，那就誰決定了埃及的命運。

中國則不然，有三條交叉着，農業上灌溉不受河水之限制，且有湖及沼環繞着，無論何處都有水可得。因此不能站在灌溉的基礎上，而建立中央集權的強大國家。

中國的國家政權不是由於爲水鬪爭或與水鬪爭而產生的。只拿一個簡單的事實便可以證明。如十七世紀滿人之來中國，及十三世紀蒙古人之來中國，很明顯的不是因爲他們原來替中國人謀幸福，到是來幫助中國人和水鬪爭的。中國國家是在農民與游牧民族的鬪爭中而產生的。這是第一個重要點。第二個重要點是階級分化與其人民內部的階級鬪爭。

我要對第一點先來說明的。中國一切過去的歷史，完全是中國人民鬪爭之反映。先是山西省的擴張。中國人是北印度與米索不達米亞，中亞西亞與塔里木等許多國家來到的。因此，中國人民是很複雜的，中國的語言即可指示給我中國民族成份之複雜了。南方語言與北方語言相較，南方語言近於安南語言，這就是山西農業向前發展；因此

，山西與文化較低之人民爭鬪，佔領他們的土地。這樣，族長的權力如灌溉結果一樣，也增長起來。但中國人民歷史之發展，決不是就這樣終止。住居在北方的游牧韃靼——蒙古民族不斷的企圖破壞中國人民的農業發展。如果考查孔子時代的著作——詩經禮記等，我們就可以找出許多與韃靼——蒙古民族戰爭的記載。當時歷史家稱爲『胡亂』。去年曾有法國歷史家的著作，也搜集許多材料專門記載中國民衆與這些北方韃靼——蒙古游牧民族戰爭的歷史。

在這些戰爭中，鞏固了政權，早已握得有許多土地，並且有了軍事的組織。但因為農民同時要耕種，與參加戰爭的困難，於是創立了諸侯的民軍，這是特別武裝起來的隊伍，他們負擔與那些韃靼——蒙古民族戰爭的責任；又創立所謂武士，凡武士可自己不須耕種，而依賴農民爲生，封建的政權就是這樣的產生的了。

封建政權沒有把全中國統一起來，而是有許多諸侯各據一方，其原因，則因為當沒有商業資本之發生與貿易之衰微及交通之梗阻，封建政權當沒有具備能統一那樣大的中國的物質條件。我們看到以後的中國歷史，即封建諸侯相互鬥爭的歷史。

爲什麼要發生鬪爭呢？是因爲各個諸侯都是想盡可能的佔領廣大的土地與居民，以供養自己的兵士，所以各封建諸侯間相互的鬪爭，也可以說，就是爲爭奪農民而鬪爭，更明顯些說，就是那個封建諸侯能奪得多些。爲了這個鬪爭，在各封建諸侯間，就發生了千年不斷的鬥爭。

根據上面所說的，我們已經知道，中國的政權——同其他各國一樣——是從戰爭中產生而決不是和平性質的。中國的歷史，即使在封建制度前崩壞的歷史，也是繼續不斷的戰爭的歷史。各個朝代就是在戰爭間成立起來，消滅下去了（同樣的，在俄國，法國，英國）。其後，蒙古，滿洲，兩個異種民族征服了中國，所有這些都不是和平性質的……。蒙古人佔領中國後，從新恢復了已經崩壞了的封建制。中國農民暴動的壓迫者——滿洲與明代貴族聯合而侵入中國掌握政權，爲要中國征服轉戰二十年之久，但並不能統治全中國，在中國南部創立了許多很大的自治王國，這些王國，雖然是表面上表示服從，實際上並不受中央的節制。這些都是可能的。我們知道，在十七世紀，甚至海盜也握有沿海一帶，形成一種自治的勢力，清朝對之也無可如何。這樣看來，若說中國的政權是從和平中產生的，這完全是毫無根據的空想。

現在我們站在階級觀點上，來觀察孔子的話和凡爾加所說的中國政權是從和平產生的，不是壓迫人的工具，這些話究竟對不對呢？我們站在階級鬥爭的觀點，來考察中國歷史上所發生的重要事實。

在階級鬥爭中間，產生了國家政權，而國家政權常常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工具——這種鬥爭，在起初是封建諸侯與武士爲要屈服農民的鬥爭，使農民的農村公社屈服於直接掌有土地的封建主威權之下，抑或屈服於每個農村公社徵收賦稅的封建主。孔子的著作，就是反映這個時期的情形。有個俄國的教授柴可夫爲考察中國封建社會的階級成分，研究了『孟子』這本書，在他的文章中，我們可以找出許多引證，敘述對農民的剝削並提出在周朝（爲孟子所贊美的中國封建制度與盛繁昌的時代）封建政權怎樣強佔了農村公社的土地與企圖保存自己的舊時公社的農民徵收賦稅。這個鬥爭的過程在中國直到井田制度實行之後才告結束，井田制度就是指明舊的農村公社是被封建制度屈服了。

在第二個時期（井田制）之下，農民之屈服，有幾種形式，這在『孟子』中我們可以看到很清楚的。凡土地附近城市的土地擁有者，從農民所得到的採取自然物品，

或金錢的形式，而土地離開城市遠的，就一部份被武士佔據，利用農民無報酬的勞働，以井田制來剝削農民，在當時農民的怨恨和騷動是很多的。

封建制度崩壞後形成了第三個時期，這個期頭階級鬥爭的形式是爲土地私有及鞏固私產所發生的鬥爭。農村公社發生分化，富農要退出公社的組織，而中農和貧農則反對。在他們中間發生的鬥爭，繼續到百餘年之久。俄國研究中國問題專家柴哈洛夫在他的關於『中國土地關係的歷史』的著作中，從中國書籍裏面引據了許多例證說明自從土地私有制以後各地都發生了戰爭，農民希望重新恢復到以前的井田制度。他們覺得這個封建的形式比較要好些。因爲這個形式多少總可以保存公社，除了納稅與繳納自然物品或金錢外，尙能維持生活。

柴哈洛夫引據漢朝官僚的意見說：貧農的土地雖然不是私有的，但是從這些土地上所收穫的穀米可以供養他一家的溫飽不致受飢餓，而富農因爲沒有多得土地的權利，所以也是自耕自給。這樣，農民之情形差不多是相等的。諸侯只從那八個人家所共耕的在那塊土地上所取得一定的收入。

柴哈洛夫更根據中國的著作，講述這相續一百餘年的

階級鬥爭，可在黨派間，甚至在貴族自己間的鬥爭中看出來。在中國的著作中有代表擁護農民的封建的『公社』的，我們知道，在俄國農民改良的鬥爭中，地主貴族間，也有些以為恢復公社的制度，是對統治階級有利些，同時則有人反對這個主張。還是第三個時期階級鬥爭的形式，這種形式直到十世紀還是常常發現有恢復井田的企圖。

現在我們問：當封建制度完全廢除，中央集權的政府組成後，在國家政權已經不建築在封建制度，而建築在大地主與商業資本家的時候，國家政權同農民的鬥爭消滅了沒有？完全沒有。在上面我們已經說過德國社會學家維貝爾，他自己所舉出的許多單純的與具體的事實，便可證明他的理論的錯誤。他最先論及諸侯的運輸的範圍之廣大，差不多普及全中國。從國家的這一端運輸麩包，鹽，絲，茶，鐵等物品到那一端，這必須要有大量的沒有報酬的農民勞動力，不僅是為搬運，並且也是為維持陸路和橋樑等等的秩序。這樣，農民要擔負耕種時間及其他損失不小。關於這種損失之大，我們看下面一個例子便可知道。如果是要把一車穀米從南部運輸到北部，那末在沿途就需要一百八十輛糧食貨車，並且運輸費非常昂貴，這就看出國家需要多少勞力和怎樣的剝削農民。農民因為國家的壓迫

，就被強迫着做這種無酬報的工作。我們看了這些情形，而再要說中國資本主義之未發生，是因為國家沒有壓迫的力量，這當然是太沒有根據的了。按照維貝爾的計算，爲了建築長城，掘了一萬萬六千方米突農民的土地，並費了三十萬人的人工。開掘運河用去多少勞働雖然是不知道，但推想起來，那末大的工程，所用去的勞力一定也不少的了。在十五世紀爲了要鑄造貨幣及其他物品，開掘金銀等礦做工的達五十五萬人。凡這些一切，怎樣可以說沒有用過強迫的力量呢！要知道人們不是一刻即可壓服的，在人民和國家政權中間是經過了不斷鬥爭的。我們知道，秦始皇是中國第一個皇帝，他把政權不建築在封建之上；他的政權是建築在商業資本上的集中政權。那末又是那一種力量把牠推翻了呢？自然，一般舊的封建官僚也是反對秦始皇的（我又回講到貴族間各黨的鬥爭）但反對他的主要力量却是農民的勞働軍隊。這些農民被新的國家政權…（指秦始皇）強迫做極難苦的工作。究竟誰領導這些軍隊去反對秦始皇呢？這是最有趣味的一個問題。據中國的歷史說這些軍隊的首領是一個農工業者出身的陳勝與農民劉邦。後來，開闢漢朝的，就是這個農民。

明朝代表誰的利益呢？——它是代表農民的利益，而

反對從外國來的建築在封建與商業資本聯合的元朝。

關於清朝我已說過了，大概讀者全會知道它的政權的起源是由於農民的暴動繼續至十四年的鬥爭之結果，它是代表沒有被農民除去的明朝封建主和清朝封建武士聯結起來的一種政權。

擺在我們面前最有興趣的一個問題，就是中國國家政權的性質。這個問題經過我們上面的分析，可以知道中國是同全世界各國一樣，國家政權，是階級的政權。

我已經說過，明朝政權是代表農民反對蒙古商業資本與封建主的聯合。接着我又說過清朝的政權是滿洲武士和明朝殘餘的封建主的聯合。明朝政權開始時是代表農民的利益，但到後來，就轉入封建主之手裏了。封建主怎樣奪取政權呢？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就不能不轉到階級關係比較複雜的『政權復辟』的問題。在上面，我們看見封建制度打倒後，它又重新恢復起來，同樣，我們看見農民朝代後來轉入封建的朝代。講到這裏，我們已轉到中國歷史上最有趣味的幾個社會問題，這些問題，要仔細研究，特別對我們農業國家的革命者，有極大的政治意義。

在中國，農民好幾次奪取政權；同樣，農民政權也好幾次轉變為封建的政權，為什麼這樣呢？如果中國現在與

起了農民的政權，那爲什麼不轉到別的政權，舉例來說，爲什麼不轉到現代資本主義的政權呢？爲什麼農民經過爭鬥而且是戰勝了的，仍不能立自己的政權呢？！爲什麼農民有時甚至奪取了政權，而仍重新轉到封建的政權呢？關於這些問題，我們在下面必須要詳加以研究。

第四節的開始我們已經知道，中國的國家是階級統治的工具而引起戰爭等等，但是還沒有回答中國國家究竟是屬於那一個國家的問題。

從整個中國過去中的歷史，我們以歷史家眼光，可以看出中國國家發展有兩種：屬於地主階級的地主國家，及屬於農民階級的農民國家。中國國家的發展完全是在這兩種範圍內的。

我們補述每個朝代的變遷，說明中國歷史兩個的變化并分析其原因。就是要說明爲什麼第一種國家地主階級的發展成爲歷史的主幹，而農民的國家雖時常表現而僅是歷史中的一段插話。

中國國家的起始，也如其他國家一樣，是開始於封建時代。我已經說過沙可夫所引徵的孟子著作，專門給我們分析這封建時期的實際狀況。因此，現在我們祇要謹說到周末時代中國封建國家組織的幾個重要現象。

其實，這種國家與歐洲封建國家無絲毫區別。它代表的是幾個小諸侯國家的聯合，而不是嚴密的中央政體的組織。中央政權是發生於戰爭中的，最強的封建諸侯征服了其他的封建諸侯而集合他們的實力，使結合被征服的諸侯與中央發生聯繫。我們看一切封建國家皆經過的封建諸侯組織系統的內容，就是天子爲一國元首，但實際政權是不能行施於各個王侯的。形式上，各個王侯是受命於天子，實際上，政權完全掌握於各個王侯。爲什麼呢？原因很簡單的，因租稅是取之自然的產物，在當時交通情形之下，從各國諸侯國裏來運輸這些物產是不可能的。中央政權之生存僅依賴天子直接管轄的土地範圍，而諸侯進貢天子的爲珍奇而稀有的貴重物品，且往往距中央愈遠而進貢的也即愈少。

官吏，（即士大夫）在國家內如何存在呢？中央任命的官吏完全沒有，天子是不能指派官吏到各地的。地方官吏僅服從各地的王侯，假使誰讀過孔孟之書，就可以知道各地諸侯貴族所任命的官吏如天子所有的官吏一樣，各自有其領域和官殿式的衙門。這些官吏俸祿是什麼呢？所領有的俸祿也是封建的形式，諸侯給自己官吏爲土地，分配爲小的領域，而官吏依賴此領土而生活，如諸侯區域一樣

。所以官吏大半也是產生于封建的性質，官吏的地位也大部分爲貴族子弟所佔據。德國法國及落後的俄國也是如此。這樣國家的組織是中國歷史的第一個時期。牠與任何國家封建制度是無區別的，有些歷史家想找出中國封建制度與歐洲封建制度的不同處，於是便說中國專制君主是神學上的性質；中國君主天子二字爲上天之子，因此，天子爲國家宗教的首領；但我們知道在中世紀的歐洲國家，也同樣有這種傾向的皇帝或君主，是直接服從于上帝的（天皇）也就是各個國家的首領。但這點決不是對理想哲學有特別的精神情緒與想像的，諸侯天子是依靠剝削農民爲生活，很明顯的宗教的政權是使人民絕對服從的頂好的工具，但諸侯天子不能將宗教權完全掌握，因爲歐洲在王權與宗教及僧侶爭鬥前，國際天主教的組織從羅馬教王起已形成強固的團體了。總之，君主與僧侶及教堂爭鬥，顯明地是爲分配教權來統治被剝削的農民民衆的思想。

中國封建國家的階級實質，就是地主剝削農民的機關，然而，這剝削尙未到有最高的形式。歷史告訴我們，大凡在自然經濟存在時剝削民衆的程度，決沒有實現貨幣經濟（或即在商業資本發展的初期）時期那樣高。此外，在封建時代鄉村公社的遺業——在中國爲井田制——在相當

程度之下還可預防農民的破產，

中國工藝之發展，由純粹封建（孟子之所說的）變化到別的階級，經過了很長的時期。這程度變遷的軸心，就是在自然經濟開始變到貨幣經濟，生產工具及交通方法的改良，所以也就形成比較集中政權的基礎了。

秦始皇實行的改革。實際是預言中國歷史有更進步的發展。這種改革，確是想依賴貨幣經濟來組織完全中央集權國家的企圖。這是經濟統一過程中政治的表現，也是隨貨幣經濟發展的產物。

秦始皇的改革究竟是什麼？

秦始皇首先企圖消滅舊式官吏制度。舊式封建的官吏是僅和各個地方政府相關連，而脫離了中央政府的。秦始皇企圖裁撤地方諸侯而創造新法。回憶十六世紀俄國的暴君顏洋也曾採用過。秦始皇取消諸侯的土地，裁撤封建貴族的代表，和因諸侯分立而興起的貴族及官吏等；改從中央委任官吏，監察地方的皂隸所謂朝廷監官。這王之欽差大臣，在歐洲已實現過的，他開始任用官吏，不由於封建貴族，而由於有才幹堪任職守任務的人士，他分官吏為十六等俸祿按官吏工作與時間而定的，但不以土地而以定量的貨幣了。

秦始皇首倡皇帝意志超於古代經典的主張，落後的封建階級却企圖以古代的經典來反對中央集權國家組織。但秦始皇回答的是皇帝與其命令超一切古典的，且君主不僅頒發命令，并據有實力，所以他毫無遲疑的坑埋擁護舊制度的儒者四百六十人。但是假如規定封建系統的孔子書籍仍然存在，也大是妨礙新制度的發展，因此秦始皇不僅要消滅道統思想孔子之徒，并且還要燒毀他的書籍。

後來，在中國作品常用道德觀點來爭論秦始皇的變法是好還是壞，這樣看問題是很笑話的。我們看到秦專制主義之發生，很明顯的，他（絕對專制）必然用種種方法來反對妨礙建設新政權的思想勢力的。

那麼，秦始皇依靠那種階級呢？這可由我們上面所說的兩點看出：第一，秦始皇用貨幣付官吏薪俸，第二，任命的官吏非封建階級分子，僅就這些事實看來，在經濟方面與封建時代比較已發生很大的變動，就是貨幣經濟已代替了自然經濟，農民一部分的產品不僅是為自己的需要，而同時為市場了。我們在孟子書中可以找出，在封建末期市場已與農民生產品發生關係，既有了市場就有商人階級的出現。

秦始皇就依靠在貨幣經濟的代表——新貴族等級與商

人，而與封建諸侯戰爭，關於這點，司馬遷曾告訴我們很有趣的奇傳，我們在呂不韋略傳裏可找出富商幫助秦始皇的事實，在很多中文的材料中，更能證明當時商業之作用與其範圍。但是僅就我們所有的材料已可決定在短期秦朝史中表現在政治行程上的一般社會性質。當封建制度末期由封建社會產生一種新的商業資本階級秦朝的政權，就建築在這種階級上的，同時依靠他以反對一切舊的封建勢力。

在中國史上還有一個關係于秦始皇名字的問題。這名字的性質，很顯明的是由於經濟變化中產生的。特別是農村公社遺跡之消滅，井田制在秦始皇就結束了，自然這不是簡單行動的結果，而他在中國史上延長二百四十一年之生命；但這漸漸破壞之制度的消滅，似乎由於秦始皇的行動所致。農村公社只可保存到農民不變為商品生產及發生私有土地的時候，別一方面沒有私有土地制度，就不致使貨幣經濟或商場廣大或迅速的發展，因農村公社是保存在自然經濟之形式裏，他的破壞，即成為秦始皇建立中央集權國家之企圖的基礎，且農村公社之破壞而成為組織中央政權的條件比政治改革還高。中世紀的歐洲各國也同樣的存留這農村公社之遺跡，但貨幣經濟在反對封建政體中，

同樣也消滅農村公社之制度。

自公社之破壞，農民即失其近鄰之憑助，及補救破產之方法；於是引起農民大不滿意，然彼等所反對者何？所反對者，即國家與當局所憑藉之社會勢力。與封建奮鬥之中央集權國家，剷除社會中之寄生成分，於是其所設之政治，遂直接與農民相接觸。農民不能分析客觀發展之過程，惟知貨幣經濟之發達，而剝削即隨之而增高。惟見在新環境下之農村中，金錢勢力與不平共生，及新國家當局所設之賦稅，兵役等等。同時，國家之農民等謂公社制度之破壞者，等諸族長社會之毀滅者。由此，我就明了大部份農民之所以與舊的封建貴族同樣敵視政府及政府中之新社會階級的原因了，

反對秦始皇的究竟是誰呢？即我們所見最饒有興趣之混合階級，而過去的封建餘孽——已消滅之諸侯及封建貴族——與農民。何以如此呢？其原因也很簡單，中央集權之國家，自領偉大之軍事與商務之建設，組織軍隊，徵收重稅。故國家所受之敵，不僅過去之失勢者，即農民羣衆亦立於敵對政府之地位。在族長社會制度之時，農民生活較易，因當時地主，恐失去其爲被耕作之農民，若遇災荒，不能不加以援助，所謂地主不能宰殺其產金卵之鷄是

也。然當貨幣經濟發展，土地成爲私有之時，一般農民，全陷於自然之手。——非自然界之自然，乃更十倍危險之社會自然。雖殘酷之河流改道，農民即無力抵禦，然尚可逃避。但若受商人高利貸者之迫壓與奴隸，則更無從免於貧困不堪之境遇。於此，我們可見統治之封建階級與農民民衆之關係了。

在歷史方面，此無足奇。吾人苟舉諸新歷史之事實。如十八世紀末，法蘭西封建之消滅，則可見官僚擁護舊制度爭鬥的，不僅是上級貴族，如在萬得時之農民羣衆，亦左袒舊制度，因隨貨幣經濟而來的新制度，使之痛苦更甚的緣故。

秦朝年代甚短促，秦始皇尤如俄國之大彼得然。彼用全力以超越歷史之發展，而不圖俄傾之間，爭紛即起，皆企圖撲滅他一切的建設。然而在他統治時期中，已表現出有組織一種集中政權的企圖，爲這種政權形式的鬥爭，經過若干世紀，一直至元朝，方形鞏固，而轉瞬間化以明清兩朝，然此種政權不旋踵又復降落。

自秦始皇開始採用這種發展之途徑，以後中斷者屢。然吾人之目的，非依編年秩序，以研究朝代之改變，不過於中國整個歷史中探求中國國家發達之兩種途徑，因此無

妨跳過幾世紀來說。以後說明漢朝爲受經濟發展影響而墮落之農民政府爲例時，再回叙此時代。現在我們所要討究的是元朝的政體。元朝爲中國專制發達之極峯與歐洲十八世紀末葉之極端專制政體同。元代之純爲地主與商業資本階級合組之國家亦非偶然，元代統治之時，亦即中國經濟發展最高的時候。此經濟發展之根本，即蒙古族蔓延於全亞洲，使亞洲之財富均集於蒙人之手。中國之工廠產品，經蒙人之手而推銷於中國國境之外。蒙人之來，係戰勝者，故完全封建性之社會制度。馬可波羅於記載各省區之著作中，屢述其印版式之語，城市堡壘彼處甚多，其距離不及二十四英里之封建堡壘羅列於全中國。例如彼記載之區域，滿格興京城杭州府者（當時爲臨安）或京畿，據彼述，大汗分滿格爲封建九國，立九王而各爲王國。然此種國王，受大汗之管轄，每年之中，彼等各於已國內，爲大汗徵收租稅及各種珍品。馬可波羅所述封建組織之管理如此。

然按社會情形，元朝又非社會國家，乃地主與商業資本提攜之結果。當時中國商業資本發達的程度，使歐洲十八世紀最先進國之代表——馬可波羅大爲驚訝，商業工藝交通之發展，國家之富強，歐洲任何國家，均莫可比倫。

於彼著述中，吾人所見者，如富饒之都市，可以千百計，與人民之數目，商業工藝之種類，即彼時時之讚頌：『城市既大而富，商人衆多；商業工藝之民族，最大多數的絲業製造『各種之商貨』『武器與鞍韉等……』凡此均足使當時歐洲不特驚奇，且至於不信。

彼詳述在歐洲所不能見的大道橋梁等之優美建築，完善之國家郵務組織；於二三十里距離內，即設有站，每站之中，即有若干馬匹與御者，且不憚煩，歷數商品之種類，及非常衆多之河海商艦等。

試舉其記載汗京——北京——商務之著作，（當時蒙人稱北京爲汗己乃克）馬可波羅首先舉娼妓之數目：『彼處營樂之妓女，娟好者達兩萬人。每日商旅及外僑往來者甚夥，故均應接不暇。妓女既如是之多，則在汗巴拉人民之衆，自易了然。至所有珍寶物品之數，更非世界上任何城市可比。余首述由印度輸入者，如寶玉珍珠及其他珍品。中國及其他區域之精美尊貴物品，均會萃於此，以供奉此地之皇室，貴婦，諸侯，將佐，及大汗朝中之臣僚。故余謂此間之富裕，及所有之奇珍寶貨，爲世界上其他城市所無，商品之交易亦多。每日所到之絲，何只千車。并製造金絲呢絨及絲織品等。而此間四週之城市，遠近計二百

，均至此購買其所需者。固無怪巴汗拉如此發達，即余所述者，即當可了然矣！』。

然不應以爲馬可波羅所述統治階級之商業，僅限於奢侈品，其於普通必需品亦然。彼所舉例，如鹽業一項，即國家收入之一。并有國家買賣糧食之組織。『當大汗知糧食豐足價廉之時，彼即令多量收買，分存巨大倉廩之中，并令妥爲保存，可三四年而不壞……若遇五穀不登，價格飛騰，則大汗糶出已存之糧食，如某量麥，售價若干，則彼以四倍之量，售同等之價。糶出之糧食，務使足夠供給完全之需要……』

而最足表現元朝商業之發展者，厥有幣制。紙幣在當時，甚爲暢行。馬可波羅曾詳述國庫券之準備，及其自由行使於全帝國，并可兌換國家之新券及貴金屬等。

自蒙人統治在亞洲衰落以來，一般強大之獨立帝國，即分據亞洲西南之領土。中國對外商業關係遂喪失，致減少國內商業之地位，而影響於國家之政局。國家當局不僅不採外貨入口之保護政策，更使中國閉關自封。

然純粹封建之恢復已不可能，貨幣經濟蔓延於全中華，商業及工藝之地位，自不能消滅。我們在前面已知中國之官僚，置已有之資本，半於農業半於商業。我們試問明

代於廢止初定之農民政策以後，究係代表那個階級，而清代又是怎樣？實際上此兩朝已非封建地主之政局，而為與商業資本發生關係之地主政治。中國此種國家政權之組織，一直遺傳到近世紀。然此種中國國家政權之性質，以歐人視之，亦無足異。以我們習於歐洲發展性者之眼光看來，中國之發展狀況更不奇怪，其與歐洲國家發展所不同者，即商業資本自十八世紀以來，中國不特不能往前發展，而反退化衰落永遠停滯於手工業生產狀態，所以中國未能形成消滅專制主義之資本主義，因而資本主義性質之國家所發展亦以之停滯。中國國家發展終徘徊於專制與資本主義統治之過渡中。此專制主義，即基於地主與商業資本者——此種停滯狀況，於官僚政治之變化中，更為明顯。此時，官僚之成分，已非僅限於貴族式之官僚。在十六至十八世紀之際，中國政府所徵用之官吏，不僅來自地主，同時亦來自小資產階級，商人，手工業界，或農民的隊伍。中國高等程度的文化使這階級性的國家能在極廣大人民等級中找出他需要的官吏人才。經過考試而受官爵者有數萬人。魏白耳計算，在中國由科第而躋高位者，三萬多人。此地主商業國家，在資本發展，經濟集中，均形衰弱，以及交通不便的狀況之下，如何能防止各封建分立之國家再

現，與官僚之自由獨立統治其境地的形勢恢復呢？中國發展之整個統系，即適應此項目的——預防封建制度之恢復；同時亦為過渡至資本主義制度之障礙。中國監察吏之設，即此項制度之表現。此項制度表現之事實，即上級官吏，依據法律，在某一地域內，其任期有一定年限，政府如此規定，究為什麼呢？這就為免去封建的危險。若任官吏久居一地則彼手握大批物質財產，而有投置於農業與商業之可能。尤其可能的，是投置於農業。因為動產是容易損失的。一二十年後，則彼根深蒂固，而為極有權勢之大地主可變為超國家而獨立小諸侯。中國官吏之至某省，雖帶有附從，然時有不知此省之語言，故常有依賴小級之地方官吏，實際工作都操彼輩之手。而領袖彼輩之任期，亦不過三年而已。因此，政府即能担任大官吏不能冀圖指揮此省，甚至脫離政府而獨立的危險。

但以缺乏在各省行政機關上實際的監查，及中央與各省間連繫之薄弱，政府在其他方面即只得對一般官僚們讓步。官僚們很早即不按他從租稅中所得的數日照實數交與政府。官僚們在很久以前即投機於報告許多不幸的事，和最低限度的人口數目與中央政府。我想，中國統計中一半錯誤——特別在謊報洪水，災荒，盜賊等巨大的災害。後

之貧困——大部分在於官僚靠他的詭計從人民的錢糧中藏一部分到他個人的腰包裏。無疑慮的，關於這點，可以拿某一時期中國人口統計忽然增高的事實，來做鐵證。在一七一三年政府和官僚成立一種調和契約。因有這契約，官僚就不怕人口過多，政府便要大批的索錢糧了。於是，人口統計便忽漸增加起來，至於這調和的內幕就是規定了各省的行政官一定要交付北京政府固定的錢糧數目。在這契約之下，即使各地錢糧增加，政府亦不多索取。從此時以後，官僚們亦用不着隱瞞人口增加的數目了，並且他反可因人口之增加以誇耀其治理該區之功德。我們由此可以看出當時中國人口統計何以忽然增加數百萬的道理了。

1713年的調和契約，在原則上有很大的意義。他表示出中國未到資本主義前所謂中央政權所能到的範圍，國家在此堅強的範圍中保證自己一定的收入，中央政府得到一種在封建制度進程中所沒有的力量。強制官僚交納政府一定的錢糧，但是她沒有力量約束他們按照地方發展的程度以交納。政府給與他們以一定的期限在某種程度統轄某省，你在這省隨你括取多少，可是須徵納政府以規定的數目。

這樣，假使我們從階級的觀點上問中國政府是代表那

一階級，那末即可以說在他發展的根本路綫上，在過去時期純是封建國家的特色，地主的政權，而當耶穌降生以後，即中國歷史的中時期，政府是絕對的專制。這專制制度即是建築在地主階級及商業資本的基礎上，逐漸鍛鍊出來的。從西歐的歷史中我們知道在商業資本統治的時期中幾乎沒有任何疆域中，組織在資產階級之手的政權的。我們看見在此時期中幾乎到處是專制制度的統治。如此，若是我們現在還是重覆德國的學者大法里德里的見解，以為中國的政府不是代表地主和商業資本的利益，而是全民的利益，或者如歷史家所謂保育全國之君主，便證明相信西歐和中國的歷史家斷定的中國官僚是代表有學識的人，他們在國家中之統治，並沒有代表任何階級的利益……便太愚蠢了。

根據以上說的，得出結論，我們以上講到過的，自然就可以看出整個幾百年的過程我沒有提到我未答覆了的問題，如在這幾世紀中國的政權究竟代表那一階級，比如漢初明始，以及王安石變法的企圖那種社會的基礎等等。

在這階級中究竟是隱藏些什麼呢？在西歐歷史家看來，不過是處於紛亂的無秩序的或者是冒險的改革時期。加魯寺教授作了最新中國史，他一樣的語氣侮辱中國漢初明

始以及王安石變法的歷史，他認為這時期是強盜的無思想的改革，不合實際的空想的著作家并不知道他自己說的什麼話。可是在事實上，我們來觀察一時期，我們即可看出當時偉大的農民欲建設本階級的政權，以保存農民利益的企圖。爲了觀察這一時期并且不曲解了牠，這一定是我們最饒有興趣的問題，待我們以下予以解釋和討究。

農民之企圖建設政權是中國史上的特點。當商業資本的初期在歐洲除了古西的農民戰爭外，再找不出國家中有什麼農民繼續統治的國家，所以中國的農民運動有特別的原因，必要極深刻的研究，這種歷史問題的觀察對於我們是更有興趣的，這個觀察更能使我們注意到現時中國重要問題之一：在一般的國家中小資產階級的政權是否可以成爲永久統治的政權。

四

自秦始皇帝統治時代起，中國國家的政權已不是地主單獨統治的形式了，而同時却還沒有走到資本主義統治的時期，資產階級之所以能統治，首先就是他在經濟上完全占主要的地位，然後在國家政治上有統治之作用，即資產

階級在與其他階級合作分掌政權時（例如十九世紀歐洲之普魯士資產階級與地主分握政權之形式）資產階級的利益總是佔優越的地位的。

中國貨幣經濟僅發展到商業資本占主要地位的時期為止，還未能形成現代工業的資產階級。但是我們曾經說過中國歷史上的特點就是農民政權，現在我們把這代表農民利益的統治權時期的所以然與其特質，加以詳細的研究。

第一我們要知道漢朝是怎樣得天下的呢？可以說，就是靠農民的勝利，秦始皇之滅亡，也就是封建諸侯和舊封建官僚與農民聯合反對秦始皇及其依靠分子的結果。當秦始皇失敗時，而這種聯合即分裂了，地主和農民間，便起了衝突。劉邦又轉而與封建諸侯爭鬥，並且得着許多勝利，農民勝利首先不過佔據着一部分區域，而其他地方仍為封建主所有，但經過相當時期後，政府勢力已逐漸穩固，已足以征服其他相與角逐的各封建主了。

但是，這勝利的結果又怎樣呢？我們知道——中國歷史家也這樣承認——漢朝政治的組織就是秦始皇集權制與封建分權制的一種混合形式，我們看到劉邦之不得已任命一部分舊諸侯為高級官吏，同時還保留自己威權監督他們，就是這混合政權的表現。漢朝政權雖較秦末政權為有力

，但不如秦始皇政權那樣的集中。

怎樣可以說明這回事呢？農民政權雖然勝利，但勝利之後照牠的本質看來，自然表現出牠沒有可能直接利用政權力量指揮偉大的國家。集權的國家只有建築在代表集中經濟的階級上才有實現可能。當時便是商業資本集中經濟的力量，但漢朝政權不能直接依賴商業資產階級，因他之得着統治，就是由於依賴商業資本的政權爭鬥以來，他的傾向是反對商業資產階級的利益，也就是在這基礎上農民團體與封建諸侯才能聯合起來，一直到戰勝秦始皇為止。商業資本還未發展到充分力量，可以打破農民和封建力量之聯合於當初，及當農民力量與建封諸侯爭鬥，而對他又不能支配農民自然的運動。但是農民本身，只能管理鄉村或縣邑，至於他們政權和勢力擴大愈遠，則他們關係的渙散也是一樣的遼遠。法國經濟學者柏黑來爾在經濟史上曾設問說道：——城市與鄉村之距離，只使農民攜着商品來往路程便知道了，那末，農民乘馬每日可以行若干里呢？每天只可行二十俄里，如果連回去在內，那就要多花一天了。總之，農民不能無利益的多費來往工作時日，因此，他的關係也就不能達到數十俄里之外。重覆柏黑來爾的話，我們可以說，農民政權擴張之範圍，則限於農民離鄉村

可攜帶商品來往之距離，只有壓制農民和用暴力或商業利潤的殘酷驅使農民的那種政權可以深入較遠的城市。俄國農民在建築鐵路前，由黑海與安魯夫期海運輸來往要幾個禮拜，但農民是靠這種工作的工錢過活，因之也很自願的作工，因商人僱傭他當然付給他工錢。至於沙皇政府驅使俄國農民，不僅徧歷全俄，比如驅遣他與拿破崙戰爭和派遣農民過阿尼軍山到產甜柑的國家去。（按：即意大利）

但農民政府，當他仍保持為農民政府時，而對他並沒有可能操用經濟與行政的方法，使農民遵照政府的意志。這個事實也就表現出農民政府政治上之弱點。關於這種妥協的混合制之所以發生，還有更深刻的原因，我們曾經說過了，在研究農民政府的經濟政策，我們還可以看出的。

當我們自問時——漢朝和明朝初時政權本為農民政權性質，何以後來却改變採用地主和商人的政策呢？——首先就以為是農民政府腐化，這些朝代離開了農民的觀點，直轉到其他階級的觀點上去了。農民政府的腐化是農民時常所推想到的，在一切國家的農民完全不信任他自己希望有的政權，這點過去的事實先生告訴我們是這樣的。

究竟是什麼力量引起農民對農民政權之不信任，本來政權是一種力量，可以獲得利益，可以為財產之積纍，也

就可以與階級分離的。

一點用不到懷疑，農民政權之腐化過程，在漢朝與明朝史中有牠的作用的。我們看勝利的農民代表，高居皇宮，生活優美，收括農民賦稅，同時從戰鬥中積聚很多的財富：佔據廣大的土地，并投資於商業，但這不是有決定之意義的。

漢朝實際上也企圖保護農民利益，澤學老夫在他著作中國之土地財產中云：『漢朝的政治自覺地對貧窮人民採用各種方法，使他們富庶，最大政策更使他們得着充分的生活之工具，政府無代價地分給他們荒地，公地，及林園，獎賞官吏常期免除賦稅，以賣官爵收入，補支出之不足，勸諭農民對農業之工作互相幫助，借貸牲畜及種子并教導用牲畜勞力去代替人之勞力，改良耕種方法。為便利除草及天氣時起變化時，及發展農作物起見，作寬大之溝渠，如此可以使收穫更加豐富。』（見『俄國宗教特派員』第十頁（一九一〇年）。

這樣，可見漢朝初期對農民尚注意保護其利益，但在當中屢遭失敗，至失敗的原因我們下面再說。

漢朝四百年之統治為中國歷史上之黃金時代，北方有知識的中國人，常自稱為漢代後嗣，當漢統治時，農民傾

向是異常有力，在四百年過程中官吏——有大部分來自農民——爭論的問題是要不要消滅私有財產及恢復井田制度環境，繞着這些問題而爭論的有各種黨派，關於此點，澤哈老夫告訴我們的有當時更確實各件之引證。此問題在中國史上延長了許多時候，而為漢代各黨派反覆爭論之焦點。澤哈老夫說：『關於奪回富者土地及恢復共同耕種制度的意見永久保存着的，并延長繼續到以下各個朝代，差不多所有的中國皇帝的書中都是同樣論調，雖然對此觀點有許多不深刻徹底的意見，總之，這思想印入中國人的腦經已有幾百年的時期，並且足以指導政府的行動。』

為什麼發生消滅私有財產的問題，理由甚簡單，一在周朝末就已開始發展的貨幣經濟已使農民中發生很大的分化，是就所謂引起農民階級分化的過剩，同時產生失掉土地的貧農，在這當中一切土地歸大的私有者購買或占有。秦始皇決定廢止農村公社法定之遺物，而農民政府要恢復農村公社之專制，當用和緩手段，不斷改正社會情況時，便發生疑問，貨幣經濟及私有財產既然繼續不斷的使農民破產，是不是要恢復農村公社呢？他方也有反對這意見的，他們指明貨幣經濟且已長期的發展，而私有財產久已實現，要用強力來改變經濟到古代關係，事實上是不可能，

且貧富階級已經分化，若預講援助貧者而奪回富者土地，那富者要堅決地爭鬥，很特別的漢朝之官吏中有說道，用不着怕貧者的反抗，並且要故意挑撥富者起來暴動以便剝奪他的土地。澤哈老夫說在政府官吏中當時有些（特別是熱心的學者）暗地鼓動富者之思想使起暴動，因此利用機會更快地便利地以他們反抗政府應受處罰為藉口沒收他們土地。

我們在此處可以看見當時階級爭鬥之緊張，因為假使在官吏富民而沒有對大批貧窮羣衆說着，而政府官吏也不會昏暗地援助人民或定出類此的計劃。

但事體總之是貨幣經濟之必然發展佔勝利了。大批的私有財產者置金錢於土地，私有財產之餘留而又與市場發生經濟關係。在這私有財產與商品關係之基礎上，就發展與鞏固了新的地主階級。自然這地主階級完全與封建形式的地主不同，隨着市場之發展，於是新起的商業資產階級便佔據重要的意義。經過相當時期，政府亦不能不注意到新興的統治階級，同時一切設施更多站在這新階級的觀點上（政府腐化的過程更助長其發展）而很少注意到復興的農民有推倒地主的力量。

這種農民政府之變化開始於漢，這種變化的象徵同樣

形式實現於其他農民朝代之初期——明朝。

在貨幣經濟戰勝後，雖然消滅土地私有財產及恢復井田制度均不可能，但農民問題仍未解決，農民仍繼續不固定。於是，政府為避免革命的思潮起見，便採用改良的政策，以稍可減少農民貧困的地位。至此時漢朝已完全與農民隔絕了，本身即擁有許多私有的土地與地主及商人發生關係了。雖然近世紀初年，王莽曾提出農村的改革，但這并不是因為王莽想恢復遺傳之舊制，而是政府仍然不是農民政府的原因。同樣現象我們看見在十一世紀之王安石重演此事時，仍是改良的。這種改革的原因，就是因為中國土地之缺乏和人口之過剩，人口過剩感覺最甚的沿江兩河岸的耕種土地之自然條件及技術程度所使然，因之他們僅能在灌溉地方從事耕種事業。

因為土地缺乏之故，於是農村問題，便成非常重大之事件，並引起普通的注意，暴動的農民，各朝皆有如赤眉，黃巾，白蓮教等亂——這種農民運動，常有同一的根本原因，即地主的政府，每當農民勢焰高漲之時，亦同樣發生一種必要的問題，以後怎樣呢？若不改良農民的生活地位，他們便要推倒地主了。

王莽的改革是怎樣一回事呢？他想限制一個人土地所

有的數量的最高限度，就是禁止百畝以上的土地集中在一個人人手裏，誰有超過這數量的土地，國家便沒收他，而轉給那些沒有土地的人，他訂種種法律，要是誰以為這種方法為不善，那就把他流放到外國去，要是誰直接破壞土地所有法，即是誰買賣土地超過最大限度？那末還有一個最大嚴厲的處分——殺頭。王莽的改革，不過繼續了三年，他自己也應該取消自己的法律。

要是我們再看王安石的改革呢，雖是差不多行了二十年，可是終歸破產。所有的農民暴動的勝利，所有由上而下的改革的企圖，終被貨幣經濟戰勝了。這是怎樣發生的，并貨幣經濟是怎樣打破了法定的範圍呢？

古希臘人說，得有最堅固的城牆，也擋不住滿載黃金的驢子，金驢能穿過城堡的牆壁，何況法律比城牆弱呢？要是禁止超過土地買賣的一定限度，那末這土地可以說不是買的，法律上認為這土地是屬於耕種者所有的，但事實上另屬他人而是名義上的所有者，事實上須付出自己收穫之半給別人。

澤哈老夫關於唐朝的土地法寫得有：『對的，買主雖然富足，也不能超過法定的數量；但是常有一種不犯法的可能，有錢的人，對他再買的土地，另以家中任何人的

名字登記，如此他雖是只有少量的法定的區域，而一家之中便有幾十或幾百頃了。因為荒旱或發生戰爭的時候，常有破產貧窮的農民發生，他們為納稅購買牲口及新種子等，不能不向富者借貸，而富者以貧農不能償還因而奴使之；或者就不改變土地的登記亦便取得債務人的土地，或者使用農民的土地與勞動力。這種情形，不只是中國才有，例如蘇聯的農法，禁止賣地；在最近時期以前，連租地都禁止，可是一般富農，在飢荒的時候想把土地取得到自己手裏，便秘密的由貧農手中租來，同時貧農都應當耕作此土地之一半，或是訂他種苛刻的條件。

為了保護農民的利益，所以在去年改變了這個法律，許可公開的出租。因為在從前租地，完全是秘密的租主往往向非志願而讓渡土地的窮人，表示自己的冒險，便定種種苛刻的條件。蘇聯政府以為在鄉村中，貨幣經濟，還存在便應當許可租地。貨幣經濟的存在，是不容許這種限制的；不過貨幣經濟的成分，因受社會主義經濟的排擠，所有從貨幣經濟所發生的結果便要消滅了，蘇聯政府已經採用種種方法，并有各種相當的條件足以排擠貨幣經濟。

在中國改革派的情形，便完全不同，他們對商業的發展力，只能用充軍與死刑的威嚇。要農民生產品的大

部分不是自己的需要，而是出賣；要是他的商品用貨幣來表現，即是商業已經廣大的佔領經濟界了。

在商品經濟存在的時候，而想限制農村中個人的儲蓄這是終歸失敗的。

中國農民政府的破產，不僅是因為他與農民分離而過渡到其他階級的地位；還因為在貨幣經濟的基礎上，沒有方法可以保障農民的利益，政府之從農民轉到其他階級性質的，這種實事，不過是這種情形的表現而已。要是漢朝不會有，或不能有種方法保護農民利益，那嗎，自然牠變成一種保護地主與商人的去了。

漢朝的官僚，深居朝廷裏面，完全與農民脫離，所以他們的善意及個人的情形，與農民政府失敗之主要原因相比較，實屬於次要的原因。

在蘇聯當商業關係遺跡還存在的時候，一小部分的官僚的腐化，也是不能担保的，但是對於這種現象，無產階級的黨，有很大的覺悟，以為力量，不在乎國家當局個人的本能與性質，而在乎保護勞工利益的經濟保障。

蘇聯政府之所以允許租地，是因為有許多方法，足以影響農村；比如工業運輸機器，——等等。他之所以退一步，就是因為有很大的後備，可以提高農民的地位。在建

立社會主義基礎的資本主義發展中有一種保障農民利益之可能。一直達到社會主義工業的強大，便能改造農民的關係，改造農村。

在貨幣經濟發展的初步，還沒有工業，也沒有與農民相關的無產階級以圖保護他們的利益的時候，而想達到這種目的，完全是烏托邦的空想。如十九世紀蒲魯東派的社會主義者的計劃，便是這樣的烏托邦，他們以為可以不管市場與貨幣經濟只設立勞工銀行，即可使工人階級與市場獨立。

農民政府不能成為長久存在的事實，因為農民戰不勝初才發展於商業資本的資本主義，資本主義發生於商品經濟與貨幣經濟，生存於此種經濟中的農民即為資本主義之奴隸。資本主義把農民分化了，窮的變成無產階級，富的變成資本家。其中還有大批的中等羣衆介乎貧富兩者之間在工業發展的地方，無產化的農民便投到那裏面去。但是中國的所有工業，不過是手工業，以後也不過小製造場（Manufacture）。所以自耶穌降生的初世紀起有幾百萬農民賣了土地，但是在城內又找不着工作。這個問題，在中國當時初期的農民政府，便不能而無法解決了，所以完全不在乎官僚的變節，而農民的朝代——漢朝——便應當破

產了。在最後的明朝破產也是同樣的原因。

倘若我們願意詳細的研究這個過程，我們可以找得出明朝與漢朝許多相同之點。他初興時候，行動是一個農民政府，但是到十七世紀，終被農民的暴動推翻了，因為在他滅亡以前，久已不是農民的統治而是地主與商業資本的統治了。

根據上面所知道的，關於中國農民暴動的歷史，給我們這樣的教訓，即或農民有勝利的可能，但是這種勝利，在歷史上是無結果的。農民的統治在歷史上是不曾有過，也不會有的，因為農民的統治，同時即是城市的統治，貨幣經濟的統治，而貨幣經濟與市場中，即有貧富的存在，貧者即是富者的奴隸。中國農民所得的政權，早晚都是要被自然的市場打破，倒台的，或者竟轉變成地主與商業資本的一種政權。

關於這種的材料，最有趣味的便是王安石改革的失敗，他們直接的告訴我們——他們措置是怎樣的一個結果；價格的高漲，市場的混亂；一般把資本積累在土地上的商人，失掉了這種土地，便暴動起來了，改革的結果，便是使市場完全混亂。現在資本主義的歷史家，還以為這是彷彿是一種冒險的幻想；實際上我們看起來，這名是冒險，

乃是階級的一種悲觀。這個階級，不能建立自己的統治（但是他認為這是平等的，平正的統治，）仍停留于貨幣經濟的地位上，同時又不能逃出貨幣經濟的範圍。

在開始我們已經說過，中國及歐洲的學教，都告訴我們，說中國是一個奇怪的國家，莫明其妙，彷彿是一個倒立的國家；說是農民的國家，而農民不是土地之所有者；若是貨幣經濟的國家；而鄉村沒有什麼分化，沒有地主，所有的土地，所有的土地都分成小的農民所佔有，這幾千年的大國，沒有階級，政權的代表者為任何人，及任何方面，等等，皆為無關的智識界所組合。

這種傳說，在我們看起來，一是也無足可取；我們知道，根據中國歷史上的實事，更根據資產階級中的較好關於中國歷史的敘說，已足以推翻這種無根據的傳說。

我們看見中國的發展，也有階級的發生，有商業資本家，貧農，富農，地主——等等階級，要是我們研究中國政府的性質，研究他所代表的階級關係，那就我們完全明白那思想的無價值，完全是由孔夫子的原理，在中國所發生的思想，自然也為歐洲資本主義學者所樂為相信的了。若從階級的觀點上看來，孔夫子也是對的，他生活的時候——要是他生活的時候，如他書上所寫的一樣——各階級

剛才發生，在理想方面，是聰明的人，自然以為統治階級的利益，與全民的利益是一致的。但是現在的學校引用這種思想，不過表示資產階級的虛偽而已。

我們已經知道，這種傳說，完全是無價值的，國家是永遠有階級性的。在中國也是一樣，中國貨幣經濟發達之時，便是商業階級與地主階級所統治，他們的利益便是各種變化的原動力，在中國的歷史，從秦始皇起，所有中世紀時代的官僚，都是代表這個階級，但是這個階級是破壞農民的。而資本主義的發展又停滯，因為工業沒有充分的發展，農民便沒有出路；城市中不能收容，農民的自民勞動力。因此我們可以看到，中國與歐洲各國的差異點，有時農民得着勝利，而組織自己的政權，在這些時代的官僚，也不是超階級的機關，不過是代表鄉村中的小資產階級的農民，這種農民統治政權的時代成為中國歷史的特點，這種特點，我們在歐洲是找不着的。但是，因為歷史發展的傾向從小資產階級中，又產出一般統治階級，而阻抑農民改革的實現。這些，便是中國歷史演進的特點，以及與歐洲比較的區別。所謂莫明其妙，恍惚迷離的帝國，還是給我們分拆的可能，並且我們可以打到堅決的出發點，以便今後在中國革命歷史原動的研究。

在下面我們將要現代資本主義所影響到中國的發達而所生的變化問題。這裏，可以給我們一個基礎為研究中國階級中所生的變化；以後，我們便能認識中國的階級關係，以及各階級出現於歷史舞台的運動；再後，即說到近代在中國所發生的歷史變動。

五

現在我們開始來研究中國自外資侵入後直到 1911 年革命這個階段中間社會發展的情形。至於 1911 年這次革命可以說是在歐美資本主義所引起的仿效西歐同美國社會變化的基礎上發生的。

這個時期應當從 1860 年 1895 年到中國的商業發展起，因為商業是外資侵入的一個最好工具，外國資本利用中國商業便開始在全國發展其影響。

馬克思在 1847 年發表的共產黨宣言上曾經說道：『資產階級既急激的改良了生產工具，又不斷的開拓了交通機關於是把所有一切，甚至於野蠻的人民都推之入於文明道上了。那價廉物美的射擊力，就是中國的城壁也被打破了；就是極端排外頑固的野蠻人也只得降服。世界各國

爲要免得滅亡，也只得將用資本家的生產方法，她將所謂文明輸入他們的社會，就是要把自己也變成了資本家。換言之，資產階級將按照自己的模型改造了全世界。』

資產階級用自己廉價的商品打破了『中國的城壁』，1847年馬克思說的。

但是我們知道在實際上若是沒有大炮替廉價的商品掃開一條道路，爲運輸廉價的物品到中國，他必須將用真正的大炮作爲他的先導。從1860年代兩次的鴉片戰爭國際的資產階級用武力破壞了中國的城壁，——這裏說的自然不是在中國北部的萬里長城，而是政治上經濟上把中國同其餘的世界市場的閉關自守的城壁——但是到後來我們看見爲使廉價的商品運到中國，破壞中國農民的經濟，使中國資本主義化，總之這一個破壞還是不夠。在上面所引的馬克斯的觀點是在當時已經開始的自由貿易的時期很深的影響之下所發生的。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說，物美價廉的貨物，侵入資本主義落後的國家裏面的主要條件不是自由貿易同他的廉價的商品，而是帝國主義同他的大砲，借貸，建築鐵路。

鴉片戰爭的歷史，我們上面已經說過。現在我們只回憶鴉片戰爭後所得的政治上的結果。

他的結果就是有兩個：

- 1, 1842 年的南京條約；
- 2, 1858 年的天津條約。

在南京條約上外國的資產階級得着了什麼？第一，這個條約強迫了以前只准外貨通過廣州的北京政府開闢了五個商埠：廣州，廈門，蘇州，寧波，上海。此外在南京條約上取消了在廣州香港壟斷外對貿易的商人組合。在訂這個條約以前，外國商人到了廣州只能按照這些商人組合所規定的價格買他們的貨物。自從訂立了南京條約以後，這種商人組合是取消了。他們可以在這規定的五個岸口上自由的買賣。這就是說，擴大了他們的勢力。

在南京政府訂立以前到廣州的外國人，不能夠自由的行動，自由的購買土地，建築房屋，僱用僕役，不能自由的同中國官廳接洽，而必須經過香港的商業組合中間的介紹。在南京條約上承認了外國商人的領事裁判權，不受中國法庭的裁判，而只依本國的法律受本國領事的裁判。並且領事可以直接要求中國官廳保護他們的利益。他們可以在開闢的口岸上，購買房屋，可以自由的建築。

此外，根據南京條約中國政府必須與外國締結關稅的特別條約。

在 1843 年的附約上，又規定了中國的關稅。凡外貨納稅不得超過貨價百分之五。假若商品的價值是十萬元那麼，所納的稅就是五千元。出口稅也不得超過貨價百分之五；但茶商則例外，茶葉可徵稅到貨價的百分之十。

南京的條約所立的條件就是這樣。南京條約訂立後十七年的天津條約上，外國的資本家又取得了些新的讓步了。

第一，西歐各國有在北京駐公使之權。在以前若是那一個國家與香港的地方官應有訴訟爭論的時候，當他地方政府就這樣的答道：『吾輩遠隔朝廷，毫無所知一切自有君王決之』。現在在北京有了公使的存在，就可以保障外國資本家對中國政府種種的約束了。此外，除了 1842 年已開的五個口岸外，又另開闢了十個商埠。中國在當時尚沒有鐵路，所有的石路很壞，所以外國商人只能與附近這五個商埠的人民貿易，但是新開的十個商埠就使外人在中國交易的區域擴大了三倍。

此外，外國的商人可以到中國內地去旅行，他們可以深入中國內地達十三月之久，使他們有可能去調查什麼是他們應當買的，什麼是應當賣的。這一點對於條約上所載的傳教自由上也有很大的關係。在表面上看來高尚的宗教

好像對商業上並沒有什麼關係，但是英國的一個外交總長當人問他為什麼這樣掛慮傳教師的時候，他曾經這樣的答道：『傳教師——是棉花』。這意思並不是說紡織品是從傳教師製成的，而是說傳教師好藉宗教的宣傳，可以深入到中國內地，可以充當頂好的經濟偵探員去偵察英國紡織品的銷路。此外到傳教師得到了中國信徒的時候，外國的資本家可算是在本地更得着了他的中國代理人了。爲使這些人作外資的內奸起見，傳教師對於他們在政治上法律上加以保護。

因此，這些教徒也就樂得作外資的走狗傳教師的代理人了。

其次在南京條約上的讓步就是對外貨免除釐金的徵收，釐金原是在太平天國戰爭時政府爲了戰爭的費用而實行的一種稅則，釐金是商業上最大的一個障礙。中國政府此時停止徵收外貨的釐金後外人只在所納關稅百分之五外，加納百分之二零五來代替厘金，外貨就可以通行各地無阻。最後，一個重要的讓步就是允許外人公開的輸入鴉片。在這個條約訂立前四十年中間，鴉片是禁止買賣的物品，現在只納百分之七的稅，就可以公開的輸入了。

從此以後外資的勢力便得到了劇烈的擴張。在起初他

的勢力只是在口岸上，和海上貿易尚沒有伸張到內地大陸。因此外國的資本家極想把這些條約的權利擴張到內地去。

爲實現他們這個計劃曾利用了許多中國人與外人的衝突。當英國佔領了緬甸以後，就派了許多的教師到雲南作經濟上的偵探。當時有一個英國的軍官在雲南被殺，英國就藉此強迫中國政府擴大外人的權力，特別是必須允許緬甸與英國通商。後來當法人因佔據東京與中國人衝突時法人也得到了與英國同樣的權利。

總而言之，這些條約主要的就是使外國的資本在中國得到充分的自由。現在我們就看外資在這些自由的基礎上怎樣的發展他們的商業。

現在我們說到外資侵入中國後，買辦——外資能在中國發展其商業的工具——的發生。

這種買辦的組織不但在中國的歷史上有很大的意義，並且在中國史上政治經濟方面都有很大的作用。我們應當很詳細的認識，他使我們將來分析中國各種資產階級的時候就容易明白。那麼，我們先問究竟外資侵入中國遇到了些什麼樣的困難？第一種的困難，就是中國不是一個整個統一的國家，而是一個分爲許多省分生活各不相同的大陸

。雖然中國的商業已有了相當的發展：如金子能從中國的北部運轉到南方去交換，以及鹽和五穀，從這一省運到其他各省的事實。但是這並沒有湮沒了中國經濟的零落的狀況，因此結果中國就不會有一定的真正交通的路綫。

中國的國內貿易多是繞行中國舊有的彎曲的道路，但這些道路對於西歐資本主義的侵入並不更利。列可哥芬 (R. hetgoveu) 關於中國的道路曾經寫道『中國北部的道路固然有好的，但是有壞而彎曲的道路特別多。』

在南方則有水道同步行的人道兩種。中國十九世紀的道路遠不及元代；愛利斯 (Alece) 同列克陸 (Leklu) 在他們所著的『中世紀的帝國』，一書上這樣的寫道：『從這些中古時代所遺留下來的大路，可以看出中國在中世紀的文明，因為傾慕這些文明使馬哥波羅 (Navk plo) 及其他旅行家，不惜遠道到中國去旅行，這些大路的建築是採用很進步的技術掘溝，鑽洞以消除高地的障礙，理整填壕，通過低地坑溝的阻攔；這些道路寬達二十到二十五個半，用石砌成，路的兩旁栽以樹木。沿海每隔五個基羅米突有守衛所，旅店，飲馬的水槽，換馬的驛站，及有哨兵的保護旅客。

市場的佈置有適當的距離，河上有堅固的橋梁。但是

這些道路的遺跡，到現在僅僅成了一種很好的紀念品，到了十九世紀這種狀況完全改變了。

中國在地理上分成了許多的區域，這些區域中間互相都沒有密切的聯繫，同時又因為資本主義不能把近代的交通工具——鐵路——馬上就搬到中國，所以他到了中國就好像古代的佛厄基(Venengen)的商人到歐洲或中世紀魏禮齊(Bgzantium)同意大利的商人到北歐洲的經商一樣。

若是我們研究了歐洲中世紀經濟發展史，那我們就會知道，當時的商人是怎樣的困難。譬如商業很發展的意大利的城市在當時還不會從哥奴役(Gehoa)航行到英國或是佛郎利(Fiancers)的船。意大利商人必須由洛涅(Rhône)萊茵(Rhine)河運貨到佛郎利。就是會造船了以後，也是要三四個月才能到倫敦，到了之後，大多份的貨物就已經損壞了。在中國又沒有橫貫南北的河流，雖然有長江在經濟上聯貫了八省，在南方也有許多很好的水道，但是南北只有旱路的交通。

從這些道路的狀況看來就可以明白這些道路並不能作幫助商業的工具，而反是商業上的障礙。在愛利茲與列克陸的書上也曾這樣寫道：『因蒸汽的應用，中國沿岸的交通比較內地特別的便利，內地的道路，運河，都比較明朝

壞就是比較三四百年以前壞。除了山東，江蘇，四川，湖南的幾個地方和靠近口岸的地方以外，所有以前的大路都頹壞了。許多地方的道路變成了溝壑，橋梁也毀壞了，更有許多地方的大路只遺下了大路兩旁的人行的小道。在田地裏大部分的道路都是寬二三尺用非沙石敷成的道路，在這些道路上僅能容轎夫的行走，雙馬當然很難並行了。關於大道，中國有這樣一種俗語『十年有利，萬年爲害』。道路的建築既不是石板敷成的，而且是險阻不平的；路的形式都是很直而不彎曲的，（好像法蘭西，意大利古代的道路一樣，這些道路都是傾斜到二十七度甚至三十六度，這樣簡直和梯子一般）一直的通過山嶺。因爲這樣的道路形式，所以山西省的煤在本地賣七角錢一噸，在距離四十到五十基羅米突的地方就要賣四兩銀子，即是十五個佛郎，而隔一百個基羅米突的地方就要賣十兩銀子，即是26個佛郎，再增一個基羅米突的距離，每噸煤的價錢就增加二個半佛郎了。路途既然是這樣的困難，煤的價格而漲到這樣的程度，當然也就沒有什麼奇怪了。

第二個大的困難即是中國複雜的貨幣制度。制錢在中國是很普遍的流通單位，一兩銀子合一千個制錢（但這並不一定；當納稅時官廳常按三千或二千六百計算）。商人

設有專司運錢的錢商。在中國各省有各省自己的最高貨幣單位，在各口岸採用海關兩，政府計算又按庫秤兩；此外在社會上流通的尚有所謂西班牙洋，墨西哥洋，各省的城市又有中國大洋。這樣繁雜的貨幣單位，使商業感到異常的困難。

外資侵入中國遇到的第三種困難，就是中國商業的組合商會，雖然在香港對外貿易壟斷的商業組合是取消了，但是中國內地還存在有地方上商業的組合。這些組合不僅是一種互助的組織，並且是一種操縱金融，規定物價的團體，以及反抗外資的勢力。在外國商人的談論中間，就可以看出外商對這些組合是怎樣的恐懼，因為這些商業組合可以不賣給他們貨物，抬高物價，抵制外資等等。

除了這些根本的困難以外，再加以外商不懂中國的語言風俗習慣。這使外商在深入鄉間吸取原料上更加上了一個很大的障礙。

在這種種困難之下外商所得的出路就是組織買辦機關，利用買辦作外國資本家與中國市場的中國介紹人。（這裏應當知道，就是這裏所說的並不是在中國內地交易的介紹人）。

買辦的第一種形式就是：一個收買者奔走於買主或賣

主之間，他用廉價從農民或是破產的外國商人手裏把商品買來，他再用高價把商品賣去。他僅用在他買與賣的兩個助手可以用微量的資本就可以經營他的事業。

買辦的第二種形式就是：這個買辦的本身並不買賣貨物，他只是作雙方締結商約的介紹人，這種買辦，旋轉於中國商人農民和外國商人的中間。

但是這種小的中間介紹人並不是外資侵入的主要工具，歐洲的商人後來就漸漸的拋棄了這些奔走於各鄉的中間介紹人，而只與那些具有資本勢力的大商人發生密切的關係。這種買辦不是在歐洲所說的中人，而實際上說這種買辦簡直是一個小的買賣的公司；這種買辦有他自己的辦事處，他管理外國商店裏所用的中國職員。他在外國的商行中蓄有保證契約的保證金。有些買辦的所抵的保證金達五十萬元之多。

買辦所作的事情是什麼了——買辦用外國商人的名義締結商約，將收買原料，運輸原料到商行的堆棧，以及與管理交通的官廳辦理交涉，支付厘金等等。洋行從買辦手中取得貨物（但有時當不盡然），當外商認為買得的這種貨物不利時，則買辦只得自己出售或是減價出售這些貨物。買辦從洋行取得他的辦事機關的費用，他還從中國的賣

主與運輸出口的賣主手裏取得物價的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二的報酬。

外國洋行所用的買辦按照交易性質的不同分爲各種形式。與政府締結商約供給政府軍器，軍裝——在下面我們講建築鐵路的時候還有種種建築鐵路的材料的供給——等的大商行有專與政府締結商約的買辦。只與政府和官僚交易，與普通的交易迥然不同。一個研究買辦問題的德國柏林商業大學的教授白聶克 (Beuke) 曾很公開的說：這些買辦是收買中國政府和官僚的工具。這些買辦每年只在政府中官僚中間來往一兩次他就可以從洋行中間取得很大的薪金。這個教授說：有許多的大的官僚也拋棄了他的官職許多文學家跑出了他那雅麗的研究室也都來幹這種不光榮不體面的營業了。

假若這個教授要是研究了德意志，法蘭西，英吉利，那他一定也可以尋出同樣的事實。

從卡德，托拉斯，在各國發生了以後，我們就可以看到許多的內閣閣員都經營這種事業。我們知道在歐洲五金商行 (Baeawin Limiteb) 的業主巴爾溫當了英國的內閣總理後他知道不便同時賣機關車，又當一國政治首領，於是巴爾溫便決定派前商務總長洛白特赫白納 貴族作他的企

業的經理，這位貴族昨天當大臣時曾從巴爾溫那裏買火車頭，而現在却代表商行出售火車頭了。這個在德國英國本是很尋常的事情。但是這為資產階級的教授却認為中國人是怎樣劣等的民族，只要有錢連高官學者都把自己出賣給外國資本家了。

這裏，關於商業買辦的作用，還應補充的，就是當他締結商約的時候，他所收入的是各種的貨幣，甚至有千兩的銀錠以及各種外國貨幣等。他為算帳清楚和檢查銀質等他有專門的助手，這種助手專以檢查在買賣中所收入的銀子質量的優劣，以免因銀質之惡劣蒙意外的損失，這般助手的作用與外國資本家的買辦一樣。

在經營商業上不僅是要與中國的政府發生關係，而同時也必須與中國的商人發生關係，因此外國銀行專有銀行的買辦，專司與中國商人接洽，他負調查借貸人是否有償還的能力，若是在他認為這個借貸人可以信任而把錢借出去了的時候，而這個借貸若是忽然破了產的時候，則這個買辦須負責賠償。保險公司也是一樣。在歐洲當時已經有了保險公司，所以在中國的外國商行，在這個時候也開設了許多保險公司。這種公司也必須僱用買辦熟悉地方狀況，法律情形等等的專門家。水路的航行上也是如此。

外資就在這種狀況下支配了中國的市場。

我們在以上看見了外資侵入中國是經了怎樣大的技術上的困難；怎樣與中國的資產階級發生了關係。

無論技術上的障礙是怎樣大，在方法上是怎樣的複雜，但這都不是外資侵入中國主要的困難，主要的困難還是在於中國經濟狀況。因為這些困難的原故從1861直到1894年的三十五年中間，我們看見外國的廉價的商品還沒有能夠打破『中國的城壁』，而只是很遲緩的慢慢的侵入於中國的經濟生活中。

假使我們要拿歐洲對中國貿易開始發展時所輸入的貨物來看一看，就立刻會明白當時的外國資本家並沒有同中國的民衆——中國的農民——發生關係。譬如我們拿1867年中國的入口來看一看，他們輸入中國的是些什麼——他們輸入的百分之二十一為紡織品，百分之十為毛織品，百分之二為五金工業品，百分之四十六為鴉片。由此我們看出當時佔總輸入大半的商品就是鴉片了！

鴉片的貿易在十九世紀特別是十九世紀末葉得着了急劇的發展。在1821年的輸入開始為4600箱，在1830年為18700箱，1832年為23700箱。後因為中國政府嚴厲的禁止，輸入額始減低。但是在鴉片戰爭後，鴉片的貿易又得着飛

決的發展。到1850年鴉片的輸入為500,000箱，1860年為830,000箱。此後又漸漸的減低。但從1877年到1880年的四年中間竟共達867,000箱，直到最後鴉片的貿易才漸漸的衰落下去。

中國究竟輸出了些什麼？從開始一直到1896年輸出的貨物僅僅是茶與絲。茶與絲的輸出如下表（以百萬海關兩為單位）：

	<u>絲的出口</u>	<u>茶的出口</u>
1867年	18,7	33,0
1870年	24,0	30,0
1878年	25,1	32,0
1887年	31,6	30,0
1893年	57,0	28,0
1894年	67,0	28,5
1897年	70,0	29,2

從上面的這個數目表看來就可以看出外國的資本在起初很長的期間中並沒有使中國的農村經濟起了絲毫的變更；就是說並沒有深入到鄉村經濟。

茶與絲是中國很久以前新出口的產物，茶的貿易因為印度與錫蘭採用新的生產方法競爭的影響漸漸的衰落。而絲則雖有日本的競爭，而出口的數目仍是不斷的增長。

鴉片的輸入對歐洲資本的侵入中國並不發生大的影響，我們假如要拿歐洲實際上主要的生產物，紡織品絲織品來看，那麼就看到十八世紀末葉歐洲的紡織工業是遲緩的侵入中國，而這些生產品只是供給一般商埠上的人民，以及靠近口岸的富農。

十九世紀中葉紡織品的入口（以百萬海關兩為單位）如下：

<u>年代</u>	<u>紡織品</u>	<u>絲織品</u>
1867	14,6	7,3
1870	22,0	6,5
1878	16,0	4,8
1887	37,0	5,4
1893	45,1	4,5
1894	52,1	3,5
1897	78,6	4,8

假若是歐洲資本家一年能賣給中國的每一個農民一件襪衣，那這個數目就比上面這個入口的數目大，這就證明當時歐洲的資本勢力還不能伸入到中國的鄉村。

雖然中國的五金工業品還是很落後的手工生產品，但是外國輸入到中國的五金生產品的數目還是很微小。

年代	五金生產品 (以百萬海關兩爲單位)
187	1,6
1870	3,9
1878	4,1
1887	5,7
1893	7,1
1894	7,5
1897	8,1

十九世紀出口入口總數以及中國對外貿易如下：

年代	入口	出口	總數
1805	4,2	4,6	8,8
1827	13,8	12,8	26,6
1833	15,9	13,8	29,7
1842	17,0	17,0	24,0
1845	14,2	25,9	40,1
1864	51,2	54,0	105,2
1866	74,5	56,1	130,6
1876	70,2	80,8	151,0
1877	73,2	67,4	140,6
1884	72,7	67,1	139,8

1886	87,4	77,2	164,6
1894	162,1	128,1	290,2
1897	202,8	163,5	366,3

按（從1805到1845年的數目是從西班牙洋折成海關兩計算的按1840—1860年的市價則一元等於0,63兩）

我們要拿十九世紀後半紀1866年的數目和1886年的大的比較則在此二十年的中間入口差不多增加到一千三百萬兩。

資本主義不但是不能夠發展中國的經濟，並且用他的廉價的商品破壞了中國人民的關係，使民衆中間發生了異常的變化。以致使中國入口驟加的超過了出口；在1881年超過了二千萬兩；1885年超過了二千五百萬兩。因此中國在商業上每年必須輸出巨量的銀幣，填補這個虧空。

這是什麼原故呢？社會民主黨的先生們時常這樣的對資本家說：『你們並不需要帝國主義，爲什麼你們又要這大砲戰艦呢？帝國主義不要是資本主義的病態，你們賣很賤的貨物給非洲與中國的野蠻人，你們拯救他們的痛苦，供給他們些溫暖的衣服』。實際上帝國主義並不是憑空製造不必要的裝飾。歐洲的資本家想強迫着經濟落後的民族購買他的貨物，那麼他就必須應用帝國主義的政策。並且

我們看見出口入口的增長只是在中日戰爭後，龐大的中國顯出了他的衰弱的時候，所有資本主義的國家才開始向中國投資，佔據租界劃分『勢力範圍』建築鐵路。他們爲出售他們的商品，第一應當作的就是改良中國的交通，建築鐵路。

在下面我們講到『爲租界的鬥爭』，這個時候外國資本家更確定了能打破『中國的城壁』的不僅是廉價的商品，而達到這個目的必須『建築鐵路』。

六

遠東形式的變遷，列強對中國邦交的改變，完全出於意料之外。這種在歷史上有重大意義的發動力，是國際資本主義很少想到的，這種變遷的發生就是由於日本的發動。

我們知道日本加入世界的商業與政治，較中國爲晚，在一八五三年美國的小艦隊海軍大尉柯莫多爾伯力 (Kommodore Perry) 向日本要求開港，這樣一來，使他起首與外界發生關係，數年之間，美，法，德，英等國的軍艦就出現於日本的海洋，日本的統治階級受這種的恐怖的威嚇便投降了。爲外國人開了一條到日出之國的入路，這個地方

從十七世紀除荷蘭人在一兩個地方及最低的條件之下有貿易而外，其他的外國人都禁止營業與居留的。日本統治階級的投降為百年來政治與社會的崩壞所釀成。封建貴族的統治，久已成為生產力發展的障礙，此外人口之增漲又兼以常常發現饑荒，並不是由於天災和水旱等原因，而是在一定的社會條件之下產生的，同時思潮的澎湃也顯著了。

在脫奴加瓦統治的時代，日本社會階級之崩壞，造成了失業的小貴族羣衆，這種人又是無處安身的。他方在城市裏發生了一種階級，他們知道日本的孤立是不可能的，於是由荷蘭人的介紹，日本的青年便與歐洲的科學接觸了。輸入關於解剖學及物理學等等的書籍，要是你們看伊藤侯爵的傳，你們可以看見一種故事，即是關於日本學生夜裏秘密剖尸（日本以前是禁止解剖的）以驗荷蘭的指導員關於剖解學，是否胡說。由此可以說從黑衣台西想侵略中國的時期起，若干世紀所造成的各種社會統系，一旦不穩起來了。小小的日本一與歐洲接觸，馬上就能適應資本主義的開化，與中國完全不一樣。我們知道日本開關以後，與資本主義的世界往還不久，即有所謂『明治時代』。這個時代的政治與社會的改革都是出之於統治階級的自身。為什麼在同一時期由這個統治階級能從事改良，而中國統治

方面的分子，是商業資本地主及官僚所合組的——還不能呢？我想這個原因主要的有兩點：地理的與社會的。日本是一個小國，他不能像中國那樣希望：縱使蠻族，（日本也看歐洲是蠻族）侵入他的島上，他也能夠以廣大的幅員鎮服他們；中國是大陸國家佔亞洲的一半，在中國統治階級方面，可以這樣的想，以為外國人是勝不了皇帝的，微小散漫的日本島嶼，全部都在歐洲軍艦的砲火威迫之下。再者，要是論到中國的廣大幅員與地主的數目，我們差不多可以明確的認定中國的地位，沉溺於農民羣衆之中；日本分成一些小王國，在各國之中，地主還是各區的實際領袖，他們還把農民握在自己手裏。雖然日本的地主也漸有崩壞現象，但是仍能成爲有力之統治階級，與其他階級的關係，其比重律較中國的地主爲大。最特別的就是雖然商業和手工業在經濟上有很大的作用，但日本的商業與手工業的職務，在社會上的地位較之在中國更少受人尊重，在不很大的領土上，集中的有力的并且與手工業及商業有關係的地主階級（日本的農人，久已用貨幣繳納地頭稅），他們看見砲火已向自己方面射來了，便明白如果不是坐以待斃便應馬上堅決的改變政策，這裏階級自保的傾向，便成爲『明治時代』的維新。他們最注意的，便是權力的集中

；因為要同外國資本主義奮鬥，最先應把日本合成一氣，這種集中的外面表現，就是天皇地位復興，權力仍然存留於以前的統治階級之手，不過由有名的封建貴族中組織有一個有力的中央機關——『推羅』，即從最有名的首領中所產出這種中央集權鞏固了，馬上一心的建築鐵路，新造軍艦，並用最新的方法來訓練軍隊，在當時已經戰勝了法國，在列強軍事方面，均發生一種特別影響；所以日本馬上便從法國，聘請普魯士的將軍墨爾克以整飭日本的軍制，因為要與侵入國內的外國資本競爭，日本便堅決的走上當代工業化的道路。我們可以見着此處的情形與中國所見的完全相反，大約當七十九年的時候，英美的商人從上海到滬淞想設一條小鐵路，普通的人民很願意牠，但是因為官府禁止鐵路的交通，並且以鐵軌的鐵釘入了祖先的靈魂為藉口命令把鐵軌毀了。

李鴻章作北洋總督時候，設了一條津京的電綫，但是他的僚屬因此損失甚大，因為驛站的差事在他們的手裏，所以他們便割斷了電綫而向李報告，說是風水的神割斷了的，李鴻章是聰明而最勇敢的人，他回答說，要是這個神再破壞了電綫，他決不饒恕牠。李也不過是中國若干官僚中能實際幹事的一個，而且日本的地主即刻便堅決的不作

神方面的打算了。他們所敬奉的神足以堅定人民的服從，而萬不許神阻撓機械的進化。日本在維新以後的時代，工業的發展，在每二十年之內，都表現出絕大的進步。

我們拿一點數目字以證明在前世紀末，日本發展工業之速度。

在一八八五年，日本輸入的外國棉花值三十萬金鎊，當時不過他初辦紡織工場。到一八九四年輸入的棉花量，值一千九百五十萬鎊，即在九年之間他輸入的棉花量增加了二十四倍，在一八八五年，日本所有的工廠不過十九個，不過五萬錠。到一八九三年，便有四十六個工廠，六十萬錠子。紡織工廠的發達，使紡織業的熟貨之輸入量減少。在棉量輸入增加二十四倍之時，從英國來的織業的熟貨減少了百分之四十；從印度來的，減少百分之九十。在九十年代，日本的織工業的熟貨，不僅行銷於本國的區域內，還開始向中國運輸了。如九十三年，他輸到中國的布，值四百五十萬金鎊。

紡織工業，致日本的資本家，獲利甚厚（他們的隊伍中，不只是商人，還有富饒的地主）。在一八九四，九五年之間，日本的織布工廠獲利百分之十六至二十，當時在林卡塞耳（在美國）有九十三家公司賠本。政府為保護工

業規定很高的保護稅則，這種稅則，不僅保護織布工業，而且保護絲織工業。我們看得見，雖是日本的絲質，劣於中國——我們是知道的——，而最近的發展是很迅速的，從一八八五到一八九四年，日本絲織品的輸出，由五萬四千五百磅到八百五十萬磅。

日本煤業的發達，不但是爲自己的需要，而輸出量的增加從二百萬磅（1885年）到六百五十萬磅（1894年）總計之，日本對外的貿易，於十年之間，增加三倍半。在一八八五年是五千五百五十萬磅，在一八九四年，到了二萬萬三千萬磅。把當時日本的商業描寫出來，與中國的商業比較，完全另是一頁，當時輸入的中國，第一還是鴉片，鴉片幾爲輸入口貨的大宗，布匹佔第二個位置。

至於爲中國工業而輸入的工業材料，真不值一說，在日本方面，輸入品差不多完全是爲自己的工業發展，中國的輸出不過是絲與茶，而日本却開始輸出自己的工業生產品了。

日本——四千萬人的小國，中國佔亞洲之半人口四萬萬，雖然如此，而日本對外貿易的往還，已追過中國了。日本發展他的鐵路，使他的國家工業化，但是煤鐵棉花的不足，危及他的發展，因爲這些都是生產方面所必須的。

所有這些東西，他不能不從外國得來，所以在這時期的後進資本主義的日本，還沒有成爲真正的工業國，他的資本還非常薄弱，就有了侵略的帝國主義的傾向。這種傾向，當他一出現就很有力量，是因爲與貴族的利益相符合的。一般小貴族，因爲資本主義的發展，頗形不安，他們不滿意明治的維新，不滿意政府的政策，不滿意資本主義的發展。這種原因是很簡單的，因爲在資本主義制度之內，誰有資本便算利害，而不論其出身。

在大的地主，以前便是富足的，現在在工業發展的國家之內，更能掙錢，而積累他的資本到新的工業上。小的貴族只有從政府方面得位置，而其發展，不及其崩壞之快，所以在日本政治方面，他們已成爲軍國民潮流的來源。在一八七四年，是明治時代最高漲的時候，這般紳士便主張政府與中國開仗，因爲幾個日本人的船打破了，飄流到台灣，被中國人殺了原故。（但是還不明白——他們究竟是否是日本人）

中國政府已經自知不能作戰，便給日本的償金。一時英美的報紙，都說富庶的中國是一個能夠付很大的賠償而不能作戰的國家，日本的目光之所以注意着中國，並不是但因爲自己本身地位弱小的原故，而是統治的當局，非

常明瞭國際的情形的結果。他們已經估計到九十年開始的發達，漸就衰落，將來向前衝進的，不只一個日本，所謂資本主義世界，都傾于侵略政策，所以應當準備時機；此外他們在遠東方面，有一個新政策的猛進者——就是見着俄國漸漸的向這方面的勢力膨脹。

在一八八一年俄國已開始建築海參威鐵路西伯利亞鐵路向前進步得很遠了。一八七八年俄國與土耳其的戰爭實際上，俄國的近東慾望，已被斷送了。此外在中亞方面也常與英國衝突，並且達到不用戰爭不能了結的境地了。所以只有開始向遠東活動，想找一個根據地，以與大不列顛奮鬥。但是西伯利亞鐵路的建築，實際上就是給日本一個危險的信號，恐怕滿州與高麗被沙皇政府侵奪了。這裏，我們暫不講到俄國在東方膨脹的各種特別原因，到以後我們研究一八九六年李鴻章與俄國外交妥協的時候，再論及這個。而在這裏我們不過指明俄國的膨脹，可以說明——爲什麼日本那樣忙，爲什麼日本與中國衝突，而這個突衝第一步便是爲高麗。我們知道，事實上高麗已不受中國管理，本來中國皇帝的權力，在中國本地也不算強，事實更不能說中國統治高麗，但是名義上中國還以高麗爲屬下的附庸國而服從中國的。而日本人却是不承認這種關

係，他們想把高麗拿到自己手裏，幫助所謂革新黨份子，這種份子企圖在日本統治之下，以改良在東方最落後的封建國家，但是在中國日本方面發生一種暗鬥，一方面日本輸出衛兵以保護自己的利益，一方面中國也進兵，為爭高麗的勢力，釀成各種之衝突，結果便是日本對於中國管理高麗的要求，決定訴諸武力。

德國通曉遠東及中國問題的歷史家法郎克教授，他以為中國為什麼決定與日本作戰，為什麼因高麗而戰，這個原因當尋之於英國政策中。我們以為這種說法是對的，中國方面自從他被外人用大砲的力量打開了以後，却採用極謹慎的政策，中國官場明白自己的衰弱，所以在武力的衝突，便以南方的統治，讓與法國，因新疆的爭執對俄國也有極大的讓步。所以中國與日本作戰，假使不注意英國之利用這一次戰爭的陰謀是莫明其妙的。

英國並不比日本人傻；也見着俄國在西伯利亞的發展，也見着俄國向黑龍江前進，但是以前他的注意，傾注于俄國在土耳其斯坦的行動，即是新疆的衝突。現在呢？英國怕日本得了高麗，而俄國可以依樣的佔據滿州，那麼，在遠東方面的佈置，不在四個月結冰的海參威而在更嚴重的軍事根據地，以與英國衝突。因此，當時英國便幫助中

國政府，要是涉獵英國的政治著作，與九十四年遠東情形有關係的——中日之戰的前後——我們看得見在日本勝利以後，全部政策的改變。在戰爭以前，英國很相信中國與日本衝突，定會得勝利的。在1894年以前，英國在遠東是一區貿易的國家，輸入中國的貨品以及輸出的，都比旁的國多，香港又在他的手裏，可以支配廣東和上海。他對中國的外交部，也是最有勢力的，他想不使他的地位有所動搖，英人很明白，更是俄國能伸足於太平洋，那個時候，英俄間爲海峽，爲君士坦丁堡，爲印度的鬥爭又更繼續起來。那末，俄國在遠東能夠給英國一個打擊，照這種推測，我以爲很銳敏的德國史家法郎克的主張——認爲中國決定與日本作戰，是受英人勸告的影響——是對的。自然，要是英國知中國的戰鬥力那樣薄弱，他決不給中國以這種的勸告，從太晤士報編輯赤諾爾的著作中（出版於中日戰爭初畢之後），我們知道當時的英國外交部，在中國不僅沒有軍事的訪察使，連知道遠東軍事情形的軍事參謀都沒有一個。英國知道中國政府買了大砲，建築了軍艦；而中國實力的薄弱，是英國所不知道的，並且沒有那個列強知道這種弱，除了日本以外。

歐洲人常笑中國對於歐洲的觀念，非常薄弱，我們所

引用的英國著作家赤諾爾，他敘述在中日戰後，他在外交部的說話，他笑中國官僚分不清楚荷蘭與奧大利，即使有分得清的，但總以為荷蘭，因為他有許多殖民地，而比奧大利強。但是，假若我們翻閱中日戰史，歐洲報章與著作，明明白白表現出來，歐洲的國家，也是一樣的不明瞭東方的情形。我已經說過，法郎克記載，中日戰事初起，即引起了各國內閣的忙亂，覺得以前的評定，完全不可靠，因為日本方面的新事實，實為任何人意料所不及，以前看日本人彷彿是傀儡的小玩具的民族，縱使日本人實實在在是建設了許多工業及鐵路；不過是成人般的傀儡，穿了婦女的衣裳而已，——這個民族在實際上，將來也佔不了什麼重要位置的。法郎克說，自從一種新的，向來想不到的事實發現，這種情形非常恐怖的，所有以前的揣度都現出了一種謬誤，所以一八九四年末之戰爭所發展的力量為任何人所不知，亦為各國所恐懼的，各國外交部中，沒有一個指導人員，對於遠東的民族，有相當的了解；無論是他們關於與西方的歷史關係，或者他們彼此間的關係。一八九五年三月間，俄國的外交總長羅巴諾夫王爵與德國公使談話中，他埋怨沒有一個人能真正了解遠東的情形，就是北京外交團中，也沒有一個人的觀察可靠。據彼得堡的法

國大使說，在巴黎方面的意見，與英國對付這件事是一樣的，內閣的政策，完全是混沌的。在柏林方面的，當其更確定方針的時候，德國的政府，也沒有相當的了解與經驗，徘徊踟躕不已，纔把退職的官吏方布藍底招來（是以前多年往中國的公使）以備顧問。

遠東衝突的印象，彷彿是一種最奇妙的結果，出各國意料之外，小資本主義的日本，有力戰勝這樣大的中國。

要是我們回憶鴉片之戰的歷史，看得見那次戰爭，歐洲的國家，以少數的軍力，在狹小的區域內活動而已。在沿海的中國軍隊，不過是一小部分，所以深信中國有偉大的軍力，要是正式與他們作戰，還是一件危險的事情，但是他們驗諸這一次的事實呢！小小的日本，在各種兵都參加的正式戰爭之內，而其結果，中國的艦隊被毀，很多的中國軍隊，漸次均歸失敗，日本佔領了高麗及遼東半島，還有軍隊在山東登陸打通了到北京的道路。

中國的幼年皇帝，在戰爭結束的時候，向人民下詔，在詔書裏邊說道，每念及海陸軍的敗亡，將士的變叛，大水的決堤，種種不幸，夜不成夢，涕泣不已。（皇帝為體面起見，不肯說到日本砲兵的威力）但是這種事件，不致使他失望，還可以自己的威力，恢復軍事的勝利，可是他

的責任，在於奉侍皇太后，皇太后又要二次離京，飽受長途跋涉的勞頓。但是全世界資本主義的國家，很知道這筆事，不在乎皇太后，而是遠東方面出現了新的勢力，新的強國，這個新的強國離中國甚近，並且很明瞭中國，他出來發難而已。

失敗了的中國，於一八九五年四月十五日，同日本在馬關締結條約，不僅是實在把高麗交給日本手裏，而且把遼東半島及旅順口都給了他；事實上便可監督中國的北部，並且中國應當付賠款二萬萬元。

日本這一次的勝利，引起俄法德幫助中國，而來干涉，但是英國却幫助日本，要明白德法俄所以壓迫日本，而英國拒絕加入的背景；我們在以下，必須要留意俄國轉向東方的原因，及德國帝國主義的發生。

我們現在祇說對於遠東事件，所發生的評論；在當時著作及政治，沒有不受影響的，這一次的評論，都以爲這次事件有重大意義的。我不過引兩個著作家，太晤士報的編輯惠靈吞，赤諾爾同克爾宗伯爵，但是這很足表現國際關係的問題，在中日戰爭剛完以後，出了許多遠東情形書籍，在這些書中，有什麼樣的結論呢？赤諾爾在他書的開始，引用英前總理羅治比爾關於中日戰爭的話：

『以前我們很有幸，只是一個東方問題，但是我們常常在想掩覆他，彷彿使我們神魂都不安靜，最近又加上一個遠東問題，我以爲這種迷霧一般的事件，對於我們，將來比我們以前的東方問題更是無窮的嚴重。

赤諾爾說道，這種迷霧一般的很遠的將來，離羅治比爾說話的時候，已經很近了。

中日之戰，告訴全體資本主義世界：新的大問題發生了，比十九世紀末與資本主義接觸的近東問題還難。

我們所說的作家，用英國的眼光，對於遠東情形與一八九四年戰爭的關係，作怎樣的評論呢？他說，自從英國第一次用武力打破中國的長城，他在遠東的勢力，差不多是獨佔的，他的聲威，彷彿是亞洲的帝國一樣，他在香港及新嘉坡，佈置有很好的軍事根據地，在中國海內，他的海軍力量，常常保存着領袖的地位，以鞏固商船的勝利及其商業利益的繁盛，這種商業的利益，每年的入口，僅就局部來說，也值四千萬鎊，在中日境內爲條約所規定的口岸裏，英國的殖民也非常發展。他的語言推廣的很闊——所有一切都被他在各地佔最優的勢力，佔領袖的地位。這種地位差不多是遠東兩個領袖國家公認的，也是歐洲列強所默認的，但是在二個月的時期內這種情形大變了。中國

與日本血戰，以爲中國有潛勢力的觀念彷彿是能戰的國家；我們以前的亞洲政策，大部分就是建築在這個地方，日本以戰勝之故躋其權勢於大海陸軍國之間，而俄法德於是起而單獨行動，他們出來反對馬關條約，並且使日本拋棄他的贓物。

『我們在北京失掉了優越的地位，這種地位轉落到我們的商業的，及政治的敵人手裏，他已給我們一種精神上的表示，就是要伸張自己的勢力到衰老的中國』。

照他的意見，關於中國，應當作怎樣的結論呢？他說『就是日本的勝利，也不能喚醒中國的昏聩，適足以表現中國全部的弱點，並且使他停滯於最後的境界，但是也許有激動中國適應新環境的可能，如果這個可能實現，那麼，中國天賦獨豐的富源，原料以及勞力必將開放於全世界，結果中國即或不能成全世界的大工業區，也可成爲列強統治下的東方大工業國。』

中國本身將來又怎樣呢？關於這個事情，赤諾爾更明白地說以下的話：赤諾爾由北京到天津之後，李鴻章問他，『爲什麼在北京住那麼久超出以前預算之外？』我回答——赤諾爾記載——我想得到中國醒悟的徵兆——就希望，總督帶着嚴酷的微笑答道——你的時間沒有白費嗎？』

『一定，在某種意義之下，我相信我的時間沒有損失，可是我覺得我的攷查是落了空。無論在北京什麼地方，能夠了解或接受不久以前的戰爭的教訓的，一點也看不到，真是自己很難設想沒有再無望的，愚笨的，既弱而驕的如剛經過一種刺擊的大清帝國的中央政府那樣的了。』

他對政府的批評就是愚弱鈍，他說中國的官僚，僅是生活仰給於國家，侵蝕國家的一種人，而所繫懷的，祇是自己的利益。他們完全沒有人民這一回事，他以後寫道，不能希望中國自然的發展，他在戰後，比戰前更糟，他總括各種情形說道，中國快到完全破產的時代了。

克爾宗伯爵，我們知道他從前是印度的總督，後來英國的外交總長，是英國政府方面最有權力的人物中之一個，是東方問題的專家。在他那名叫『遠東問題』一書中，也是想洞察將來的中國。

他的預言，便是中國人也許能保持種族生存，保持自己的文化；可是關於中國民族建設，獨立，自治以及能適應國際的環境。——這完全只是海中樓閣。這也沒有什麼希奇，因為無從想到，中國在遠東將來有發展的可能。這種評論並不是沒有實際上應用的。比如從前英國侵略中國，爲的是貿易，而不是想佔土地，因之祇要佔幾個海岸根

據地就夠了。可是現在呢？他第一知道，保存整個的中國，以作英國的市場，是不可能的了，所以應當瓜分中國。第二他找到新政策的同盟者，從那時起，英國與日本已漸趨接近，因為日本是一個新近的有力者，而是與英國對立的最危險的競爭者。

七

在前面我們已說到在一九〇五年四月十五日中國締結馬關條約中，中國承認割遼東半島和旅順於日本，賠償日本軍費，及允許外人在中國經營商業。我們已說過這條約雖已締結但法俄德出而反對，強迫日本退還遼東半島及旅順，究竟為什麼英法俄德這樣討好於中國呢？我們以下要說明的就是這個主要問題。

在我們說到促成英國鴉片戰爭的原因時，我們就立刻明白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在進行遠征了。這遠征的目的，在使中國成為國際商業流通之一部；和為自己工業品出口的利益而奮鬥。英國紡織工業之利益在十九世紀後半期，已在遠東政策中起了重大的作用。雖然始而輸出鴉片，繼而增加紡織品之輸出，但英之資產階級為保存印度財產利益計，仍不得不侵略中國。

那麼俄皇政府之侵略東方又係何種經濟利益所推動的呢？要回答此問題，先要把俄皇侵略一般的性質說明。這在一八九〇年恩格斯的極著名的論文中已指示出沙皇向外發展政策的動力的一件事實，就是沙皇在與資本主義國家關係中去搶得自己富強的來源。俄國爲統治波羅的海沿岸引起的戰爭可稱之爲商業戰爭，從十六世紀資本主義式的農業已在俄國發展，擁有國家經濟權的地主開始運出俄國農業品於外國，如麵包，亞麻，大麻，木料，…等。俄國農產品占當時國外通商之重要位置。地主與西歐通商始而經剛芮商 埠德商之手，繼而只經過爲統治階級運進需要品之俄國商業資本家。

關於這問題後來俄國馬克司主義者的歷史家研究更爲完善。最著名的歷史家如包克洛夫斯基，在他著作中及列三洛夫著作中之一，搜集許多材料說明所有俄國現代化的企業——在十六七世紀那個朝代由封建制度變爲地主經濟企圖，彼得第一由貴族經濟變爲資本主義經濟之企圖——都因爲俄國輸出事業與西歐發生連繫了。要使出口貨經過波羅底海，所以爭奪波羅的海沿岸的問題即爲俄皇政府外交政策之中心。自從俄皇征服了烏克蘭，逐漸使其成爲發展地主農業之中心。以後就在對外商業意義上，黑海的作

用又漸大起來了。可以說在一七五九——一七六九年短的時期中間，俄之麵包由黑海運出者驟增到十倍。這就是使沙皇開始與土耳其爭奪君士坦丁堡和海峽的原因。爲海峽而戰爭爲運輸麵包而爭奪黑海航線的戰爭便成爲俄國自十八世紀至帝國主義大戰時代沙皇政策之一點。固然，統治地中海之英國軍艦遇俄英戰爭時，可以擊沉俄船使麵包不能出口；但君士坦丁堡如在土耳其之手，不僅英國俄國戰爭可以擾亂麵包貿易（且英不易決定此戰爭）即英或其他國家與土耳其衝突也足以使俄國麵包封鎖於韃靼海峽內。沙皇若佔據了君士坦丁堡，便可自由航行使有相當的保障，不然即在和平時期黑海出路亦有封鎖的危險。自然爭奪原因不僅爲着韃靼海峽，我們知道沙皇不僅受俄國貴族的經濟利益所指導，且爲貴族政治利益所驅使，貴族占俄國官吏及軍官中之大多數爲使他們發展計，一定要傾向於侵佔殖民地，新領土，使貴族多得行政和軍事的地位。游牧民族爲家畜飼料計，需要擴大其土地，同樣地主爲貴族子孫食祿計，不得不時時企圖侵佔新的土地了。

沙皇企圖征服土耳其和佔據他土地的計劃，時常遇歐洲列強方面的阻擾，尤以英國爲甚。一八五三——五六年之克利瑪戰爭，俄國敗於英法軍。一八一八年俄國戰勝

土耳其快要達到目的時，又因英國干涉而被拚於柏林會議。英國之所以不讓沙皇侵佔君士丁丁堡征服土耳其，因為英國本身是一個重要商業國，他自己有侵佔東方國家之企圖，君士丁丁堡在誰的手裏，誰就佔有到中亞細亞及波斯之道路。俄國佔據君士丁丁堡，就是加強俄皇在東方的勢力，英國的商業和工業家對此無論如何是不許可的。

那麼，我們要問這與俄國向遠東發展有何關係呢？這是有真確的意義的，我們看沙皇之所以轉變到遠東就是因為失敗於近東的原故。俄國向東方發展，我們知道十八世紀才開始，當時商業家史特合干夫（也是商業資本上作用的表現）供給哥薩克愛爾瑪克軍隊的軍餉，愛爾瑪克軍隊佔據烏拉山，越過烏拉山嶺，又開始佔據靠近西伯利亞之可汗國。同時俄國皇伊凡葛洛日軍隊又把瓦爾一帶的蒙古勢力的殘餘肅清了。由此俄國向東方發展便得着兩條道路，一經西伯利亞一經中亞西亞，十七十八世紀俄國一步步的向西伯利亞發展并鞏固其地位。這種侵略傾向的動力可以說便是想擴大獵取貴重皮貨來源的區域。皮貨商業在俄國對外商業中佔重要位置，就是英國資本家後來在十八世紀也被皮貨事業所引誘，起而步俄國後塵，向西伯利亞發展，於是英國合股公司因之成立。這公司一面對於西伯利

亞繼續侵略事，在經濟上加以資助，同時也供給世界商業上許多貴重商品。

十八世紀末，俄國勢力已進展到太平洋沿岸了。當埃開太林第二統治時代，全西伯利亞已屬於俄國，漸次及於白林海旁之堪察加和美洲之阿拉斯加半島等地。或者一定有人沒有聽過在十八十九世紀中，俄皇一隻腳已踏在美洲最富足國家之阿拉斯加了。直至一八六九年俄皇才以七百萬元美金之賤價數目售於北美合衆國。我們知道沙皇政府老是短於理財的人，他不明白在阿拉斯加有黃金的出產，當財政困難時，便廉價地把這半島出賣了。俄國發展雖然這樣的遠闊，可是這種侵略傾向之發展性實多半還是原始的，不過跟着打獵發展而已。照例獵者後者推着酒車，使獵者醉飲，同時，使西伯利亞流放者隨着奔跑，意在使之死於風雪中而已。沙皇政府并不想到什麼善於利用富足的殖民地。我們如果讀了六〇年代服務於哥薩克軍隊中之學問家克魯泡特金之回憶錄或六〇年代居留於西伯利亞之偉大俄國革命者巴枯林底傳記，（當時西伯利亞省長為摸拉維也夫）我們便能看見西伯利亞長官這邊境重大意義，曾經請求過沙皇建築西伯利亞鐵道。在一八五八年已擬定第一次計劃草案，但沙皇忙於爭奪君士坦丁堡，企圖由烏克

蘭經過黑海以入歐洲，因之沙皇對這計劃並未見有實現之必要。

後來當沙皇被拚棄於君士坦丁堡時候，即開始尋求打擊英國之方法了。始向中亞西亞擴展，固然侵佔中亞西亞——在侵佔巴爾幹未成功之後——的利益，決不僅是牽制英國人，並且將軍斯可別來夫之侵略直接與準備向印度進攻相關聯的。俄國完成土耳其斯坦之統治後，佔領埋爾弗即與英前鋒阿富汗接壤了。在這種方向進行中正因為地理條件之不便利，只有放棄對英打擊之計劃。但英國統治的不僅是印度，亦擁有新加坡，自一八四四年他已佔有香港，且久已在中國取得第一等商業國的地位和在遠東之優勢。從佔有遠東方面說，劃分印度與土爾其斯坦的山脈高峻使英國成為不可破裂的形勢了。但在遠東方面特別在北方，英國顯明他易於遭受打擊，所以在佔領中亞西亞後，西伯利亞在沙皇眼中自然較從前完全成為特殊的意義了。因為此當一八七八年伊爾庫茨克省長督辦伊克拉貝也夫公爵提議建築西伯利亞東部鐵路時，亞利山大第三即諭令盡力滿足這種需要，即刻委任審察七十俄里長的偉大建築問題委員會，並決定這條路線應使俄國與太平洋連接起來。

同時又建造所謂義勇隊的黑海艦隊。他的建築在和時

平時期可借爲商業上之使用，但遇戰爭時即可武裝以達軍事的目的。

從此俄國便並在與英國鬥爭的觀點上開始注意中國問題了，于是在中國人民背後也就開始發生兩個大資本主義侵略家的爭鬥，一個是英國，另一個就是敗於近東急向遠東的沙皇。

我們知道中俄間之關係開始於十七世紀，兩國間綿延陸路的接壤，使中俄發生國民接近這是不可避免的。我們關於十七，十八世紀對中國之記載還有舊式教堂斯拉夫文字的著作爲斯伯色里五斯底記載所說的或兩國有正式關係，但到十九世紀兩國關係才不是偶然的，間斷的，而是經常的性質了，同時也就成爲沙皇對外政策之一部分了。

現在我們來研究馬關條約後向中國表示友誼的沙皇政府，過去怎樣對待中國的問題，當然不是毫無意味的了。爲要估計十九世紀沙皇對中國的政策，這裏，我們有兩件重要的事實：即是一八五三年之尼布楚條約與恰克圖條約，這兩個條件證明沙皇對中國關係，爲對中亞西亞和近東所已採用的強盜式政策一樣，俄國自從侵入西伯利亞後即成爲中國東三省區域的鄰居了，俄國便佔據現時爲滿洲里車站與黑龍江會聚的尼布楚。當時黑龍江與烏蘇里江左岸

之統治權尚不屬於俄，一八五八年俄軍官模拉費也夫佔據黑龍江沿岸，在這種威脅之下，東三省的官吏遂與俄國締結尼布楚條約，劃定黑龍江左岸屬俄，岸右至流入黑龍江之烏蘇里則屬於中國，並烏蘇里江與朝鮮邊境中之統治權屬於中俄共有，但中國政府拒絕批准此約；不過後來當太平軍蜂起，同時英法聯軍直達北京時，中國政府始感覺危急不安，俄公使伊里也夫（Hgnaleev）（此人後來使於君士坦丁堡，尊如上帝），藉此機會才得與中國政府商妥達到此約之批准；一八六〇年他不但得到了黑龍江的統治權而且得到了海參威。這樣看來，中國政府對於沙皇外交上些微的幫助便要割讓極廣大的版圖，以作報酬。

六十年代，中俄接壤之新疆伊犁，發生回教徒反抗中國政府之暴動，國民提出自治的口號，組織軍隊打敗清軍成立可汗獨立國。一八七一年俄國軍隊便乘機佔據伊犁。俟中國提出抗議後便開始談判，遷移十年之久，結果在軍略上有意義的伊犁之一部割讓俄國，此外中國賠款九百萬（俄幣）盧布並承認對俄商貨稅免除。

這兩個事實證明沙皇對中國關係純採用強盜式的侵略政策。他對遠東早已注意到了，自從遠東與英國鬥爭的問題發生後，沙皇政府已籌備遠大明確的計劃。政府和外交

部籌劃此計劃時，與建設西伯利亞的鐵路問題有密切的關聯。而西伯利亞的鐵道有兩個缺點，一個是海參威為該道之終點，因二年中結冰四月之久而成無用之海港，俄國東方唯一的海軍基礎因此就不能十分起作用，同時也不能担保海軍之自由行動。於是便發生在何處尋得別一個更適宜於軍事基礎的海港問題。第二個缺點是西伯利亞鐵道為適合黑龍江左岸境界地勢之故，必須造成一大的灣形遇戰時必致遺誤時機。

因之沙皇外交尤其是陸軍部便決定鐵道之建設必須經過東三省，於是中東路之理想在建築沿黑龍江鐵道前已發生了。但中東路建築的問題并未解決，俄國結冰的海港沙皇政府首先打算佔據朝鮮灣一部分，但洞悉遠東一切的港灣的日本人爭馬關條約時要求割讓旅順和遼東半島於是也立刻提醒了俄皇政府，他便認識這兩港灣為俄國遠東的唯一出口。

為明瞭旅順之所以成為俄國遠東出口起見，且看沙皇外交家對日本佔旅順意義如何的估計，當馬關條約開始時，俄外交總長立刻報告沙皇；毫無疑慮的此次中日私約條件之最要者，就是旅順半島完全被日人佔去了。從此日人一方可直控制北京，他方可威嚇朝鮮。從他們的利害的

觀點上看來，這種事實的鄭重對於中國方面當然是很不幸的了。（註一）

我們知道洛泊諾夫——俄皇總長關於旅順口所說的重要意義雖然是對日本人，佔據旅順而發，但在相反的一方，如果在俄國人佔有同樣可以握着北京政府的喉咽的時候，那就不然了。

這就是俄國當局所企圖的目的，不過他是用許多經濟學的論證來掩飾着的，我們知道經濟學家往往不是爲他本身而找一種論證的。如果封建主爲的要搶奪農民，他很容易找到一種經濟學者，而這經濟學者的論證必定說這並不是由封建諸侯的利益出發，而却是從經濟發展觀點上看來所必要的行動。

我們現在來看爲實現開發遠東思想必須建築西伯利亞鐵道的三個論證：第一個論證是西伯利亞的鐵道在商業上的意義。費塞（Vette）總長——經濟學家——對此路建築的意義說到：『西伯利亞鐵道建立，是於歐洲，太平洋成立直接通行的偉大路線。在商業上不但爲俄羅斯，同時對於全世界開了一條新的途徑。』（註二）

假使以日子計算，這個論證固然是正確的，西伯利亞鐵道自然縮短了由歐洲至遠東的道路，比方要由倫敦到中

國去，由海道經蘇彝士運河要費三十四日，由西伯利亞鐵道不到十四日而已。但沙皇是爲這而建築鐵道的，難道他經十年之久，僱用七千工人耗費2,000,000,000盧布，爲的是幫助英國資本家輸商品到中國去麼？

在事實上完全不是這回事，最初討論鐵道建築計劃時，因黑龍江督辦和伊爾庫斯克將軍的提議該道必須由陶母斯克至黑龍江海港，在四總長之『特別會議』的經綸如下：西伯利亞鐵道的延長須要大批國幣，同時又因近境貿易的有限，於最近將來是得不到什麼利益的；不過應該承認的就是從整個國家利害尤其是軍略的關係上看來，我們與遠東交通之應從速完成，實不容緩。所以在軍略上之重要意義看來應毫不遲疑決定完成西伯利亞鐵道之建築，否則我們太平洋之重要港，與西伯利亞其餘各地交通完全隔絕，亦將失其軍事基礎之作用了。我們從軍事上之特殊意義上說來，正望軍事機關實際參加督促此路之建築，得早日完滿告成（註三）

另一種的論證，就是說此路似乎爲西伯利亞的俄國農業上有很大的意義，特別對於沿海區省。可是關於沿海濱省情形的調查，就是政府方面的報告都與這毫不相關。

『即令在質量優美的區域的生產力都不能與俄國黑土

區相比較，在沿海濱省麥類之耕種和發展特別困難。——因爲氣候條件不適宜的原因，雨降之分配異常不平均，因之農村經濟之經營完全不相宜。此外沿海濱省之糧食無論如何不能在鄰近之日本中國或美洲找得貿易地位的。第一因爲穀類質量之不良，他方面鄰近各國也並不需農村生產品；家畜事業亦處于同樣的情形。全盤看來唯一的希望只有在工業方面或可提高此地的生產力之發展』（註四）

由此可見此路對於沿海濱省人民毫無重大意義之可言。同時俄國麥子質量之不良，中國日本或朝鮮沒有一個需要他的；但我們拿沿海人民的問題來看，費特在一八九二年的報告從農民利益觀點上來這樣的說；建築西伯利亞鐵道的問題是：『農民缺乏土地，歐俄的許多省份久已表現，無疑的我們應當消滅俄國生活中這種不好的現象。』農民缺乏土地固然是不好的現象，地主有廣大土地；費特如果將地主土地分給農民那就好了，但是我們這位很聰明的總長他絕不會這樣的說出。『解決農民缺乏土地問題之最好的方法就是把西伯利亞（尤其是西部）國家的土地給農民耕種，實事上農民缺乏土地多向未開拓之區域遷移之現象現在已看出了，不過這是一種自然性質的，如果政府在

更妥當的情形之下實行人民政策，則肥美之西伯利亞之發展必異常迅速。同時無疑地，更引動一般社會學者爭向此境投資或貢獻其學識，結果此邊境區域必將走入到文明之鄉。由此看來，西伯利亞鐵道既可使此分裂的沿海濱省的農村經濟生產之發展，同時又足以解決國家之一重大問題——卽值歐俄之缺乏土地農民得鞏固其經濟地位。（註五）

這就是從經濟上來說明築路之益處的第三個論證。

現在且拿幾個數目來分析看沿海濱省實行移民事業究竟怎樣。全沿海濱省區域並連一部中國的區域在內，一八九五年俄國移民有 100,000 人，僑民的生活，我們只從描寫俄民情形的歌謠中便可以看出俄皇如何注意移至西伯利亞的農民了。（詩缺）這歌謠就是知識分子的小官吏描寫俄國農民因爲受地主殘酷的壓迫逃到西伯利亞，除貧與病外一無所有。沙皇政府很少注意移民問題，事實上政府所想的並不是關於俄國經濟的發展，農民利益的或商業利益的。俄國輸入于中國的貨物，反值六百萬盧布并且只是煤油一種貨物而已。同時俄國還須購中國茶業達 30,000,000 盧布之數及至俄國佔據東三省時，東三省工業品都還完全是英日的。此時沙皇對遠東一切政策都是由一種軍事戰略

上出發，主要的就是在反對英國。（註六）

（註一）參攷 Pokrofsky『History Revolution of 1905』俄文本525頁

（註二）同上五二二——五二三頁中

（註三）同上五一九——五二〇頁中

（註四）參攷 Pokrofsky 十九世紀之俄皇外交與戰爭。

（註五）參攷 Pokrofsky History Revolution of 1905一卷五二一——五二二頁。

（註六）Bolhovetor 的遠東的殖民主人。

八

這裏，我們講到德國對中日訂立之馬關條約也主張減輕所訂各條約的問題。

爲要明瞭德國在遠東此後的歷史上——太平天國的暴動，割據租界的爭鬥等——的作用起見，必要很簡單的將德國的發展同他的動力加以說明，因爲這樣才可以明白十九世紀末葉二十世紀初期德國在遠東發展的意義。德國雖受凡爾塞條約的束縛，但是並沒有絕斷了牠的生存。並且在我們看見牠已經又漸漸的強大起來；他從新開始在國

際的生活中發作用，雖然這種作用只是經濟的。不過這也是使我們對德國發展的路綫應有個明確認識的一個原因。

第一個問題，——就是爲什麼在十七世紀的資本主義國家中間我們完全不知道有個德國，後來十九世紀殖民地政策開始的時期——特別是爭奪中國時期——我們也不曉得德國呢？爲什麼鴉片戰爭德國也沒有參加呢？爲什麼只是在一八九五年中日戰爭以後德國才表現出明顯的作用呢？答覆這個問題必須明瞭德國一般的歷史上的命運。德國在十六世紀很有大的意義，我們已說到剛芮的作用，城市的組織，成爲十六世紀到十七世紀，北歐與南歐商業上聯絡的主要機關。我們要是讀俄國歷史，就能知道從前德國的商人把俄國市場和西歐都聯結起來了；從英國歷史中我們也可看出德國的商人在十五世紀統治了英國的市場；意大利的歷史也告訴我們，德國的商人是意大利同北歐中歐聯絡的中間人。爲什麼後來德國在這個經濟上的作用中斷了呢？這有許多原因，不過最主要的主因就是商路的變遷。

在十二世紀和十三世紀德國開始發生經濟上介紹作用的時候，經濟最發達的國家是意大利的北部，意大利人從東方經過君士坦丁堡及埃及運來東方的貨物。這些東方的

貨物運輸到印度和維尼齊亞（意大利的北部的一個城市），再從維尼齊亞經過瑞士到德國沿萊因河抵荷蘭，英國的商人都聚集在這個地方。因此在歐洲的商路操諸德國之手。德國南部的城市的工商業如紐蘭伯利，阿物斯浦哥以及其他的城市也因此得着了發展。同時剛芮的商人也經波羅的海到現在的那威，愛沙多泥亞和俄國，到普斯克夫，其次到莫斯科經商，並且從這裏運出俄國的貨物——皮，這是他們貿易中最主要的一種物品，銅，蠟，麻，苧麻等。

當土耳其人佔據了中亞細亞，埃及，君士但丁堡的時候，意大利的商業就開始衰落，東方印度，波斯，中亞西亞，中國的直接交通便被截斷了那個時候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就開始繞過非洲尋覓到印度去的海路。德國在意大利和北歐聯絡上的中間人作用也就終止了。同時這就影響到他的一般商業。俄國和荷蘭便直接開始的貿易，英國人也不經過德國的介紹開始直接和俄國經營貿易，遠出了德國的商人。荷蘭的統一使他的商業也脫離了德國商業的影響。德國的商業因此更漸漸衰落，從十七世紀到十八世紀是德國經濟完全破壞的時代，因此也引起他的政治上的衰落，由此德國便分裂成中國封建時代諸侯數目還多的諸侯割據形勢。德國在未脫離這種經濟衰敗的狀態以前在國內